

中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周边和国际环境

陈须隆 苏晓晖

[内容提要] 近一时期，国际关系结构性矛盾加剧并引发新危机新挑战，世界变得更不安宁。中国周边领土主权争端骤然升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快实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新挑战。乌克兰危机导致欧洲重新成为大国对峙前沿。西亚北非极端恐暴势力崛起牵动地区格局。西方重振势头增强，发展中国家崛起趋缓，世界经济双增长格局更趋明朗，以变革求发展的潮流更加强劲。中国所处的周边和国际环境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给中国维护发展所需的战略机遇期带来新的挑战。

[关键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乌克兰危机 国际战略格局 恐暴势力 双增长格局

[作者简介] 陈须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苏晓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14)04-0001-10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潮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风险和挑战增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形势中五个方面的重要动向交互作用，将对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带来复杂影响。

一、周边环境负面因素作用增大

中国周边环境总体保持稳定,但问题和挑战明显增加。

其一,涉华领土主权争议升温。南海在经历了2013年的相对平静后,爆发新热点。越南强力干扰中国中海油981号钻井平台在西沙钻探项目的实施,意图将西沙变为争议海域。2014年5月2日,中国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在西沙群岛海域启动作业后,越南派出包括武装船只在内的几十艘船只,对中方船只进行冲撞。截至6月13日中午12点,冲撞次数累积达到1,547次。越南还派出蛙人等水下特工,并在相关海域布放了大量的渔网和大型漂浮物。在进行干扰行动的同时,越南肆意散布与事实不符的言论,污蔑中国“撞击”越南渔船,对西沙群岛进行所谓主权声索。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本不存在争议,此次作业地点距西沙群岛的中建岛17海里,在西沙群岛毗连区内。中国各个层面一直与越南保持沟通,但越方置之不理。越南的行为很明显是企图制造新的领土争议,并已对相关海域的航行安全构成了威胁。

菲律宾则在仁爱礁制造事端。2014年3月9日,两艘装载施工材料、悬挂菲律宾国旗的船只试图向仁爱礁靠近。仁爱礁属于南沙群岛,中国对其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1999年,菲律宾一艘旧军舰以“发生故障”为由在仁爱礁“坐滩”。尽管中国一再要求菲方拖走该船,但菲律宾一面借口技术原因拒绝履行承诺,另一方面却不断加固该船,以防止它解体,以为这样做就可以维持其在仁爱礁的“存在”。此次菲方船只装载施工材料靠近岛礁的目的明显是要对坐滩军舰“改造升级”,补给物资和人员。此后,菲又推翻其不谋求仁爱礁主权的承诺。5月6日,菲武装人员在南沙群岛半月礁附近海域非法抓扣了中国一艘渔船。就在当天,菲律宾一名高级军方官员又通过日本媒体公布了一份所谓“南海防御计划”。该计划列出菲律宾在南海加大军事投入的具体目标,包括部署巡逻船和侦察机以加强海上巡逻能力等。

同为争夺中国南海主权急先锋的菲律宾和越南加紧勾结。2014年5月,越南总理阮晋勇访问菲律宾,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举行了双边

会谈。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阮晋勇称菲越对中国近期在南海的动作非常关注,要求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压。6月,菲越两国部队在越南强占的南子岛举行了所谓的“体育友谊赛”,这种异想天开的闹剧显然是在对华示威。

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加剧。菲律宾继续推动国际仲裁,越南则扬言以“法律手段”搞定争议,并已与国际海洋法法院签署东道国协议。菲越组织多国媒体赴仁爱礁、中建岛“采访”,抹黑中国形象。东盟外长会议自1995年以来首度就南海问题发表声明,西方七国集团峰会也将南海问题写入声明。美国和日本又滥用“国际法、国际准则”,指责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质疑“九段线”合法性,为相关声索国提供策应和支持。

其二,美国加速推进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政治上,美全面加强盟友的关系,特别是加大对日本的倚重。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高调挺日。奥巴马总统在访日期间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这是美国总统首次作此明确表示。美国还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提供支持,纵容日本摆脱战后秩序对其军事扩张和对外干预的束缚。奥巴马访问亚洲,行程包括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所到之处,无不允诺提供安全保障或经援。美国还尝试构建亚太地区性安全机制,主导地区规则。奥巴马访日期间,发表了美日联合声明。两国极力抬高美日同盟的地位,将同盟描绘为“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同时,高度肯定美“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日“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的所谓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美日公然宣布,两国需要强化同盟关系,使同盟“在确保亚太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经济上,美继续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奥巴马访亚期间,与日本就 TPP 问题进行磋商,缩小分歧。美国与马来西亚也就 TPP 交换意见。美国表面上表示不反对中国加入 TPP,但实质上却加快部署,制定好规则后再“邀”中国加入。更深层次,美国仍希望借助 TPP 等框架在世界贸易规则、产业行业标准等领域延续其主导地位,架空世贸组织,打造更加有利于延续西方主导地位的世界经贸格局,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面临“二次入世”的风险。

军事上,美国明显加大投入。安全一直是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点。近期,美国增大对东亚远距离预警系统、“全球鹰”无人机等领域的投入。美日正修改防卫合作指针,意在对中国。美菲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使美军得以合法地进入菲海空基地,并扩大轮换部署。美国并表示计划增派驻扎在澳大利亚的部队。与此同时,美国持续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在2014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哈格尔宣布,美军会将每年在亚太地区举行的演习增加到130次,将港口访问增加到700次,美国对该地区的对外军事资助将增加35%,军事培训和教育投入将增加40%。^[1]上述情况表明,应对中国崛起仍是美“再平衡”重要目标,而日、菲等则是想方设法绑架美国来对冲中国。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复杂考验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美国不得不重视对华关系。美国认识到,“中国因素”对其战略的成败以及对其自身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也重视对美关系,致力于促使两国关系良性发展。正是在此背景下,中美同意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归纳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相互尊重”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合作共赢”要求双方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当前,美国在“不冲突、不对抗”上有所努力。奥巴马等政要表示欢迎“稳定、和平和繁荣”的中国,认为美中合作对两国和世界有益,建议

[1]Speech Delivered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Chuck Hagel at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Singapore, May 31, 2014, URL<<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857>>.

避免出现对抗。军事交流成为双方增进互信的重要手段。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访问美国。中美就加强两军务实交流与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尽早就相互通报相关重大军事行动、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开展实质性磋商;推动两军开展更多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并建立战略规划部门对话机制,继续推进陆军交流与对话机制;将解放军总参谋长和美军参联会主席直通电话升级为视频电话。应美国邀请,中国首次参加“环太平洋—2014”军演。美坚持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与中国保持沟通。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提出促进中美军事机制建设,重申致力于尽快推动建立两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一系列海空相遇行为准则,作为中美之间的互信措施。

美国对华“合作共赢”需求有所上升。美国欢迎中方加大对美投资,承诺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投资者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重申其开放投资政策以及依法以公平和平等方式对待所有投资者的承诺。同时,美国强调中美在朝鲜半岛去核化、伊朗核问题、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中东局势等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希望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

但同时,美国并未改变其对华政策两面性,试图“规范中国”的情绪增加。美国指责中国忽视其在乌克兰、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公开指责中国“破坏南海地区的稳定”,并警告称如果国际秩序受到威胁,华盛顿不会无动于衷。美国发布2014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指责中方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方面更加强硬,增加了地区国家担忧,并炒作中国军队加强军事演习训练、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声称可能对美国相关军事设施构成威胁。美国还继续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指手画脚,并“警告”中国不要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更无端对中国发难。5月,美国司法部宣布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起诉5名中国军官,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针对“已知国家行为者通过网络手段渗透美国商业目标”行为进行起诉。另外,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表面上同意“相互尊重”原则,但实际上却回避在中国核心关切问题上给予应有尊重。尤其在主权、领土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公然支持日本、菲律

宾、越南等国对中国的挑衅。

三、乌克兰危机推动国际战略格局深刻演变

乌克兰危机以亚努科维奇政府宣布暂时中止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和自贸区协定为导火索,以美欧为幕后黑手,以反对派走上街头为燃点,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推翻,克里米亚通过公投脱乌入俄,乌东部、南部陷入动荡和冲突。乌克兰大选结果被美欧俄同时接受,但乌克兰并未“中立化”。乌克兰新政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加紧“入欧”,并试图剿灭东南两州亲俄势力。突如其来的马航空难事件,给乌克兰危机火上浇油,乌局部内战风险增大,俄乌冲突升级。

乌克兰危机对地缘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它触发了冷战后大国间最严重的一场地缘政治对抗。危机发生在欧洲中东部,这里是美欧重大利益区,又是俄核心利益区,双方必然展开激烈争夺。危机演化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直面冲撞,标志着俄在地缘战略上的强烈反弹与反击,双方互为战略对手的局面已经固化并加剧,斗争势必长期化。乌克兰危机使欧洲重新成为大国对峙前沿,强迫美投入更多精力,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形成一定牵制。乌克兰危机还意味着,全球形成亚太、中东和欧洲三大地缘政治对抗并行推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局面。美国挑拨和利用中日、什叶派与逊尼派、俄欧三大矛盾的态势更加明显,但也加剧了美国“东张西望”、“十个手指按跳蚤”的困境。

乌克兰危机对大国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它首先严重恶化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成为冷战后俄西关系的分水岭。西方对俄罗斯挥舞制裁大棒。2014年3月,美国正式对俄罗斯发动制裁,将普京幕僚、副总理、议会上院主席等7名高官乃至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列为制裁对象,此后不断扩大名单。至7月,欧盟就乌克兰局势实施资产冻结和签证禁令的制裁名单上榜人数达到72人。作为制裁举措之一,俄罗斯被逐出八国集团。美国政府于7月16日宣布了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回应乌克兰边境紧张局势的升级。新的制裁名单中包括了世界最大石

油企业——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俄罗斯最大的私营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俄罗斯最大的独立天然气供应商——诺瓦泰克公司,以及俄罗斯国有开发银行、俄罗斯发展及对外经济事务银行。其他被制裁的实体还有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以及多名俄罗斯政府官员。新的制裁标志着美俄对峙局面的一次“明显升级”。同日,欧洲理事会特别峰会作出决定,欧盟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制裁对象是“为破坏和威胁乌克兰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行为提供支持的机构和个人”,其中包括俄罗斯。欧洲理事会要求欧洲投资银行暂停在俄罗斯开展新的融资业务。此外,欧洲理事会还要求欧盟委员会重新评估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项目。7月17日发生的马航空难事件,使俄欧关系雪上加霜,美欧加大制裁力度。俄罗斯则针锋相对,做出“不容勒索”、“予以反击”等强硬表态。普京警告称,美国的制裁将使美俄关系走入“死胡同”,并损害美国在俄罗斯的商业利益。俄罗斯已经通过打能源牌进行反制,威胁中断对乌克兰的能源供应。双方制裁与反制裁的斗争将愈演愈烈。俄与西方关系严重恶化意味着,布热津斯基等曾经鼓吹的将俄罗斯拉入西方阵营构筑大西方的战略设想破产了,俄罗斯加入西方富国俱乐部并融入西方文明体系的追求遭受重挫,日本安倍政府则面临美俄二选一的难题,其拉俄对华的如意算盘也打不成了。

在国际战略环境特别是西部安全环境恶化背景下,俄“安全防范向西,经济合作向东”的态势正在加速形成。中俄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迎来重要机遇期。乌克兰危机推动俄能源东向政策。中俄在能源合作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2014年5月,中俄签署天然气合作协议。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最终将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中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上的合作也得到加强。俄罗斯将更加重视与新兴大国和地区国家的合作,从而有利于推进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和亚信会议等多边机制的发展。

乌克兰危机对欧美关系或跨大西洋关系带来微妙而深刻影响。欧美既要联手应对俄罗斯在地缘战略上的反击,又因利害攸关度不同而在对俄打压上存在立场和政策差别。美国希望欧洲增加军事投入,加强对俄

威慑,而欧并不积极,反要美增加投入。美国要欧洲加强对俄制裁,欧则担心与俄两败俱伤而避重就轻。美批评欧的软弱,欧则不满美对欧洲的忽视。有评论认为,美国的新制裁是和欧盟对俄制裁同时宣布的。然而,与美国制裁相比,欧盟制裁力度要缓和得多,最重要的内容只是禁止欧洲重要的银行机构不得与俄罗斯签署新协议,没有对俄罗斯重要企业采取实际制裁行动。美欧对俄制裁力度的悬殊将美欧间立场的差别暴露无遗,体现了美国对俄外交的“软肋”。^[1]乌克兰危机及俄与西方关系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跨大西洋关系的加固,但同时显示欧美矛盾也在发展。

四、西亚北非极端恐暴势力崛起冲击地区格局

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为主的地区恐暴势力攻城略地,打通伊叙边界,标志着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进入扩张期,产生如下影响:其一,打乱了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部署和节奏,迫使其改变政策着力点的顺序,例如,更迭巴沙尔政权的选项不得不推迟。同时,对美国“转进亚洲”和“战略再平衡”构成牵制;其二,对埃及、也门、约旦、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暴势力形成鼓舞和示范效应,进而威胁西亚北非稳定;其三,同时损害美国和伊朗的地缘政治利益,特别是挤压了“什叶派新月地带”,也损害了中、俄、欧利益;其四,刺激库尔德独立运动;其五,对南亚、中亚、外高加索、西非、东非产生“溢出效应”,刺激如上地带“三股势力”的崛起。

恐暴势力大范围扩张,有其必然性,既是一批地区国家经济、社会、民族、教派矛盾的释放,也是对伊拉克战争后遗症、美国“新干涉主义”和“双重标准”的回报。将恐暴势头打下去,已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当务之急。美国在军事介入问题上仍心存侥幸,希望地区盟友多担责,特别是伊

[1]李洋:《美对俄新制裁色厉内荏 奥巴马“制裁牌”越打越难》,新华网 2014 年 7 月 17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17/c_126763731.htm, 登陆时间: 2014 年 7 月 20 日。

拉克政府多出力,美国提供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支援,但此招难有大作用。美国压马利基政府与逊尼派重分权力、资源和财富,如不果,将推动“换马”,但这可能引发什叶派不满,伊国内政治和教派争斗更难平息。

在遏制恐暴势力冲击地区格局的问题上,西方与伊朗及中俄存在合作可能。中国高度重视在伊拉克人员和企业的的核心安全。中国外交部和驻伊使馆第一时间发布安全提醒,向在伊拉克人员和企业通报安全形势,协助相关企业做好应急预案,要求伊方确保中国在伊拉克人员和企业的核心安全。而对伊朗,中美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伊核问题、维护中东和平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1]中美已经举行了两轮中东事务磋商,并将于2014年和2015年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第三、第四轮磋商。

五、世界经济继续复苏并成双速格局

目前,世界经济的总体态势是:美国经济走向较强复苏;欧盟和欧元区处于“恢复性的复苏阶段”;日本经济高开低走,安倍经济学射出结构性改革的“第三支箭”;发展中经济体出现分化、差异扩大,新兴大国受结构性、周期性及外部性因素的共振作用,经济增长仍在放缓,但中小经济体增速普遍加快。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仍然过于温和,未能创造我们所需要的就业来改善最贫困的40%人口的生活。显而易见,各国需要加快步伐,更多地投入国内结构性改革,以提升基础宽泛的经济增长的水平,达到在我们这一代人时间内终结极度贫困的要求。”^[2]

[1]《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外交部网站2014年7月11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73631.shtml。登陆时间:2014年7月13日。

[2]《世界银行调低全球经济预测,敦促发展中国家加倍努力推进国内改革》,世界银行网站2014年6月10日,<http://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14/06/10/wb-lowers-projections-global-economicoutlook-developing-countries-domestic-reforms>。登陆时间:2014年7月20日。

根据世行2014年6月份报告,全球经济预计年增2.8%。^[1]发达国家复苏势头明显,预计年增1.9%。其中欧元区增长为1.1%,日本为1.3%,美国为2.1%。发展中经济体增速放缓,预计年增4.8%,整体增速连续第三年低于5%。其中,俄为0.5%,巴西为1.5%,南非为2.0%,印度为5.5%。^[2]金砖国家中唯有中国还保持7.5%上下的增长水平。

世界经济双增长格局更趋明朗:主要增长动力来自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仍超过三分之二。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缓解,但新兴市场风险增大;发达经济体低于预期的通胀水平给经济活动带来风险;地缘政治风险重现。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西方“唱衰”发展中经济体,但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仍高于发达经济体,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东升西降”的大趋势未变。

当前,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升,发展前景光明。但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从未遇到过的“成长的烦恼”。从外部环境看,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演变,中国面临的国际与周边环境更趋复杂,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中国外交要审时度势,紧紧把握机遇,妥善应对挑战,趋利避害,更加积极有为,为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收稿日期:2014-07-23]

[1]如果采用2010年购买力平价加权,增长率为3.4%。

[2]The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 Volume 9/June 2014, p.4.

共同营造新世纪亚洲和平发展 环境的战略创新思路

——亚信上海峰会后析

许 涛

[内容提要]亚洲是当今世界涵盖多元文化和复杂矛盾冲突的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给亚洲带来稳定,亚洲的地缘政治板块在发生着剧烈的变革,各国间相互防范的心理大大增强。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将构建亚洲安全环境的探索推向新阶段。而在克服亚洲地区安全危机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亚洲新安全观也必将经历认识的检验和实践的不断充实。

[关键词]亚洲新安全观 亚信峰会

[作者简介]许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4)04-0011-11

今日的亚洲拥有全世界 67%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亚洲的和平发展同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亚洲稳定是世界和平之幸,亚洲振兴是世界发展之福”。^[1]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今年 5 月主持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下简称“亚信会议”)上海峰会时提出的重要理念,突出强调了当今时代亚洲与世界的关系特点。在亚洲地区固有的特

[1]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21/6196012.shtml>.

殊政治文化氛围和复杂国家关系前提下,怎样才能有效地应对越来越突出的同质安全威胁和共性发展困境,并使亚洲摆脱互不信任、以邻为壑的国家关系现状,改善相互防范、互为对手的恶劣地区环境,各国政治精英对此一直进行着不同性质的尝试。无疑,已经推动了22年的亚信会议(从1992年10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倡议时算起)是这些尝试中最重要的一种。而在今年的亚信上海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借助于这个主场外交平台提出的对亚洲安全的创新认识,将构建亚洲安全环境的探索推向了新阶段。

一、亚洲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机遇、困境和挑战

亚洲是当今世界涵盖最多元民族、最丰富文化和最复杂矛盾的地区,因而也包含着最悬殊的差异和最尖锐的冲突。在亚洲的近代历史上,列强的殖民统治不仅造成了各国、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上的严重滞后,使各个民族国家在取得独立后的复兴之路异常艰难,而且还遗留下大量人为干预各国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正常发展的负面影响,使亚洲的部分国家和地区仍然笼罩在当年列强殖民和帝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阴影中。在以欧洲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亚洲从一开始就处于受支配和被影响的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中,尽管多数亚洲国家以极大的牺牲获得了战胜国的名分,但最终往往因长期所处的边缘地位和大国博弈的配角身份而受到更大伤害。地缘政治角逐、意识形态对抗,近一个世纪的“热战”和“冷战”使亚洲的政治文化版图严重碎片化。尽管上个世纪中叶以后,在亚洲出现的经济奇迹开始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刚刚开始经济起飞的亚洲又处在诸多的发展风险和严峻的安全威胁之中。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明显呈现出强劲的经济崛起势头,几条“小龙”借助于天时地利,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奇迹。接着,在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这一时间段里,亚洲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从24%上升到了

27%，对外贸易量所占的比重从 24% 上升到 36%，外来投资所占的比重从 12% 上升到 28%。^[1]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蒙受巨大打击，亚洲经济自然也不能幸免，而且因为其多数国家并不具有金融垄断、科技创新、文化产业等软实力方面的优势，多数亚洲新兴经济体都受到重创。但即使是在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时刻，亚洲经济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恢复能力。2009 年，世界经济全面衰落，整体下降达到 0.5%，而亚洲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当年的经济增长率却高达 5.9%。到 2010 年时，经济领域开始了艰难而缓慢的复苏。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 5% 时，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 50%。^[2]到 2010 年时，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已上升到了 27.4%，首次超过北美（25.8%）和欧盟（25.9%）。^[2]

然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给亚洲带来稳定。在亚洲经济快速崛起的同时，亚洲的地缘政治板块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革。随着亚洲被作为新世纪最富有活力的地区而受到世界各大权力中心的关注，亚洲地区内各国间的关系反而变得愈加缺乏信任，相互防范的心理大大增强。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权威刊物《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 2009》的统计数字，1999 年到 2008 年亚洲地区的军费开支增长了 53%，成为世界上军费开支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同一时期，欧洲地区军费开支的增长仅为 13.8%）。自然，以发展中国家为多数的亚洲地区军费开支总量的基数与欧美本不可同日而语，但如此高的增长率不能不引起世界瞩目。同时，这一突出的趋势也令人发问：经济发展真的可以给一个地区或国家带来稳定吗？就亚洲地区的特殊性而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军费开支过快增长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出了亚洲各国对各自所处的环境严重缺乏安全感。而造成亚洲各国安全感普遍缺乏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影响，也有现实的原因。

一是对立冲突的长期存在。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进程不同，亚洲

[1]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0-2010),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Geneva.

[2]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

国家格局的形成充斥着征服、干涉、制衡、对抗的历史,无数个由历史形成的冲突热点作为“负资产”遗留给今日亚洲,从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南北对峙、中日东海之争,到东南亚的中菲、中越南海之争,从南亚印巴矛盾,到中亚、阿富汗和西亚伊朗核危机,这些热点中的个别热点的不定时地发作,其烈度甚至超过冷战时期。二是发展差异的日益突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超国家、超地区流动使原本缺乏竞争力的亚洲国家和族群处于更加困窘的境地,而伴随全球化出现的强势文化入侵使拥有不同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人群不得不零距离相处,在全球治理本来就很薄弱的亚洲,原有的中间地带和缓冲地区已经被挤压殆尽,对历史上的宿敌不信任、怀疑、敌视态度成为许多亚洲国家国内政治的必选项。三是域外大国的离间作用。近年美国军力在全球范围收缩之时,却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倾斜,实施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运用被称为“离岸制衡”的手段,借助于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盟国,怂恿它们炒作历史问题、离间国家关系、挑唆矛盾升级,以此达到遏制战略对手(或潜在对手)和维持其在亚洲传统影响力的目的。上述这些因素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和充分演绎,造成亚洲地区安全空前紧张。如何破解这一地区安全和发展的困境,也成为亚洲各国政治家们一个现实的难题。

二、共同构建泛亚洲安全制度框架的创新思路

在20世纪的两次人类浩劫中,亚洲虽然远离战争的主要策源地,但不论是为了满足狭隘的民族野心的主动参加者,还是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被动卷入者,却都没能摆脱为实现本国安全而不顾及别国安全的片面安全观和针对第三国的结盟安全观的影响。尽管一些已经跳出亚洲地区狭隘视角的各国政治家努力推动并实践亚洲集体安全的尝试,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香格里拉对话(SLD)等试图把亚洲安全推向机制化和制度化的轨道;然而,依据意识形态划界的惯性、凭借大国集团利益选边站的思维,仍然左右着亚洲国家关系和安全格局的

构建。如何突破困扰亚洲安全建设多年的怪圈,不仅挑战着亚洲地区整体意识的成熟,也考验着各国民族精英的政治智慧。

亚洲的特殊性还在于,地区内各民族和各国存在着极大差异的同时,还存在着极高的彼此依存度,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家的大小、贫富、强弱的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千差万别,安全利益和发展诉求也多种多样,但这并不妨碍亚洲各国结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认知是习近平主席在此次亚信峰会上提出亚洲新安全观的重要地区政治基础,是确立亚洲安全观的认识前提。而这一基本思路包含了三层意义:一是亚洲安全的整体性要求各国的安全互为条件;二是各国不同的国家利益必须受到尊重;三是各国不同的安全利益必须受到尊重。这个基本理念从根本上区别于“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和“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等建立在冷战思维基础上的旧式安全观。

中国领导人在上述认识前提下提出的亚洲安全观,是一个基于冷静观察、分析后的缜密思维创新。首先,共同安全是基本目标。达到这一目标必须经过多数亚洲国家对实现共同安全基本原则的认同,即“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安全应该是包容的”。^[1]而追求所谓片面的安全、绝对的安全和针对第三方的结盟安全不仅不利于维护亚洲各国的共同安全,最终也会给自身带来安全威胁。“吹灭别人的灯,烧掉自己的胡子”,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在历史上屡屡发生。其次,综合安全是认识方法。这一重要思路的提出,既体现了对全球安全问题的普遍性与亚洲安全问题的特殊性认识的结合,也体现了对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认识的结合。而且,鉴于亚洲地区政治形势处在急剧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时期,“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所以,“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2]是在此认识基础上的理性答案。第三,合作安全是实施模式。这是基于上述推理得出的必然结论:既然实现亚洲

[1]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521/c1002-25046183.html>.

[2]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21/6196012.shtml>.

安全选择的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目标,反对片面的、绝对的和针对第三方的结盟式安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旧式的结盟合作方式不可取,也就必然要推出新的安全构建方式,这就是从地区安全大局出发,忽略局部矛盾,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以求同存异的胸怀,以利人利己的路径,通过信任与协作构建亚洲安全合作基本框架,这是亚洲安全观创新思路的核心。第四,可持续安全是理想前景。如果说综合安全观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想,那么可持续安全观则同样突出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发展观。安全和发展互为条件,却又不可相互替代。为了单纯地追求自身安全而忽略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自然这种在一时之间达到的安全水平必然是难以长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在亚洲树立起共同珍视良好发展环境的理念,打造出共同呵护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和谐氛围,将是促进亚洲长期安全稳定的根本前提。在这一观念中,被概括为“安邻、睦邻、富邻”的中国周边安全观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和拓展。

三、亚洲及国际安全合作中的话语权问题

亚洲安全观这一理念的提出,还强调了亚洲安全利益和亚洲安全合作的地区属性,这意味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均以域外大国和大国集团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安全制度性安排的历史行将改变。早在19世纪初美国总统门罗在国会咨文中提出了“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的思想后,20世纪初的一些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也提出了“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类似主张,因而被冠以“亚洲门罗主义”的称号,并于20世纪30年代被日本军国主义者热炒至顶点。在2002年亚信首届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曾提出“办好亚洲的事情,要靠亚洲人自己,靠亚洲各国人民的团结与合作”的主张。^[1]这一主张的提出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甚至一些别有用心心的亚洲媒体使用了“中国式亚洲门罗主义”的概念。不论是出于简单历史逻辑的

[1]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hdqzz_609676/yzxhhy_610758/yjh_610768/t10887.shtml.

机械推论,还是源于有意制造新版“中国威胁论”的阴暗动机,他们都犯了弃本逐末的错误。

中国领导人在这里指出的是包括安全合作的亚洲事务利益落脚点,强调的是解决亚洲和平与发展的根本途径。这一观点包含了以下三层含意:首先,在维护亚洲地区安全的义利观上,域内域外政治主体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只有符合亚洲各国基本利益区域合作才能调动出积极参与的潜能;其次,亚洲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塑造了特殊的地域政治文化,解决亚洲的问题必须遵循亚洲民族特有的政治智慧和思维逻辑;第三,亚洲地区国家关系的特殊现状,要求解决地区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任何举措必须以符合地区和国家关系特点的方式进行,其基本原则就是有利于亚洲各国、各族群的团结与合作。

在 18—19 世纪开始的多数亚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中,就一直一直没有间断过受域外大国干涉和主导的影响。这种影响构成了亚洲地区安全的又一特性,直到本世纪亚洲有了几个安全对话平台,仍然不可避免域外大国的插手背景和直接作用。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亚洲事务的干涉在亚洲长期处于一盘散沙而不能自主的历史时期,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无论是这些域外大国的根本利益的出发点和现实政策的落脚点,应该以置身于亚洲的外延为基本原则。如果把 2001 年的“9·11”事件理解为全球化不均衡进程中的强烈反弹的话,处于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地位的国际社会成员,对世界性极端主义问题(包括在亚洲出现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判断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差异不仅影响着他们对具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极端主义现象的认知,也制约着他们采取的态度与策略及国际合作中的行动。由于这种认知差异的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在当今国际社会盛行,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构建的公正性受到极大影响,从而也大大弱化了国际社会反对极端主义蔓延的有效性。

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仍然固执地坚持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标准和政治价值观划界,使国际社会的团结与合作在反对极端主义的努力中大打折扣。尤其是以零和目标出发构建新世纪大国关系的政

策目的,美国将仍具有相当竞争实力且已表现出将具有潜在竞争力的国际政治主体都看作对手,利用包括民族、宗教问题在内的各国国内因素牵制和弱化对方,并作为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手段。国际社会针对极端主义的立场认知、标准划定、策略应对都有极大的不同。在“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各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表明了支持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俄罗斯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还在补给通道、保障基地、情报支持等方面给予了重要协助。然而,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这种协助的理解和认同却是极为有限的。2002年初,美国国务院对俄罗斯军队在车臣反恐行动中“使用兵力不当”表示“忧虑”。而到2004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发表声明,表示“不排除美国将与同俄罗斯政府持不同立场的一些车臣政治人士进行接触”。^[1]这一态度不仅招致俄罗斯政府和民间的极大反感,也引起包括俄罗斯、中国、中亚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美国倡导国际反恐的重新认识。仅在两年之后,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将5名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俘获的“东突”恐怖分子嫌犯以政治避难名义移交阿尔巴尼亚。^[2]在对待同样性质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时,首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文主义的共性标准,而是要看能给自己带来哪些利益、给对手带来哪些麻烦。双重标准在毫不顾忌地被滥用着,这也注定了国际反恐阵营必然分裂的结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世界政治资源的配置格局又面临重新洗牌。首先发生松动和颠覆的是处于世界各大权力中心之间的边缘地带,从2010年开始持续在西亚、北非发酵的“阿拉伯之春”颇具典型意义。说到底“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即与美国和欧盟后冷战体系危机的外化有关,也是西方以双重标准经营战略重心地带的结果。不论是传统的盟友还是长期的宿敌,美国和西方面对突发的骚乱首先选择的是占据道义制高点。启用非政府组织推波助澜,更换掉老化的精英集团,这一向是

[1] <http://gb.cri.cn/3821/2004/09/09/922@294120.htm>.

[2]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6-05/11/content_4533718.htm.

美国和西方屡试不爽的既定策略。甚至突破了担心中东宗教极端主义上台的心理底线，鼓动敌视世俗政权的原教旨主义势力与政治反对派合流，以达到让“革命”具有快速完成社会动员和获得足够破坏力的目的。这种“可控混乱”的思路在埃及社会动荡和叙利亚战乱中体现的最为充分，反对派阵营中甚至集中了世界各地的“圣战”组织。美国和欧盟却对此不仅视而不见，而且继续将他们推崇为重建“民主秩序”的反政府武装而提供资金和装备支持，甚至把这些组织的集中出现与暴力行动也算在穆巴拉克或巴萨尔政权专治统治的账上。最近，美国以5名塔利班战俘交换士兵伯格达尔的做法，已被部分分析人士看作美在亚洲对宗教极端主义态度转变的信号。^[1]

而近期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及其蔓延，已成为亚洲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亚洲大部分地区穆斯林的极端主义程度原本较低，经过伊斯兰教传入后的本土化（亦称为“中原化”、“突厥化”、“马来化”）影响，伊斯兰文化与亚洲文化实现了上千年的相互适应，宗教极端主义的社会土壤已不丰厚。然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西亚北非“阿拉伯之春”的振荡对中亚各国意识形态也构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并随着各国进入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转型时期各种尖锐矛盾出现而不断发酵。从2010年以来，一些亚洲各国安全执法部门发现了多起与中东有关的极端主义分子活动的案例。^[2]就连依靠能源战略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并使本国人均GDP明显提高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发现了本国公民辗转进入叙利亚参加反政府“圣战”和阿富汗“塔利班”阵营。^[3]近期，这一态势有继续扩大和升温的趋势。“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ISIS）在中东几乎在一夜间异军突起，彻底扰乱了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的既定

[1] <http://cn.nytimes.com/world/20140606/c06reconstruct/>.

[2] Militant makes jihad calls in Kazakh language, Thursday, 18.07.2013, <http://en.tengrinews.kz/religion/Militant-makes-jihad-calls-in-Kazakh-language-21117/>.

[3] А скар МУМИНОВ,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е боевики замечены в афганском Бадахшане,” http://www.kursiv.kz/news/details/vlast1/Kazahstanskije_boeviki_zamecheny_v_afganskom-Badahshane1/.

地区秩序。它的破坏力和影响力远未局限在中东,中亚、南亚、西亚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都随之蠢蠢欲动。^[1]在所谓“迁徙圣战”的口号下,这一波极端主义思潮甚至波及中国。2013年底的中吉边境、2014年的昆明、中越边境,将这些孤立的事件与中东形势联系起来观察的话,不难推导出诱发性的思潮本源。加之2014年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撤离后阿富汗和平前景堪忧,地缘文化和民族人口与阿富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亚、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均可能受到难以预料的极端主义思潮的冲击。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大国博弈的烈度和广度不但没有随着冷战结束后的时间推移而减弱,反而出现了为分化和弱化对手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围堵与制衡。只要能够给对手制造一定程度的麻烦甚至风险,甚至可以毫不掩饰地更改和颠覆向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承诺的任何原则。国际社会主流成员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的实用原则,给亚洲各国维护地区安全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惑,也对亚洲构建有效的安全合作制度性框架构成了挑战。因此,作为独立自主意识越来越成熟的亚洲国家大有必要厘清自身的基本利益构成与安全合作原则,自主承担起营造地区和平发展良好环境的使命与职责。

四、余 论

亚信会议是亚洲国家自主发起解决地区安全与信任问题的对话平台,虽然仅仅经历了22年的发展而尚需组织、制度、规章上的进一步成熟,但在亚洲众多安全对话平台中却是最具备独立自主特征的一个。在今年的亚信上海峰会上,倚天时、借地利、促人和,着重宣示亚洲安全利益和安全合作话语权,这是中国领导人不失时机全面提出亚洲安全观的又一层时代性战略创新含义。这既符合中国作为亚洲地区负责任大国成长中的阶段与地位,也对构建亚洲安全合作框架这一长期战略目标具有积极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在本届亚信峰会上进一步强调了这样的理

[1] <http://trueinform.ru/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26118>.

念：“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1]这不是简单的道义性倡议，也不是排斥世界大国进入亚洲和继续存在的警告，而是为亚洲国家在今后维护自身利益和共同安全赢得必要国际话语权的郑重声明。尽管在现实亚洲地区事务和安全合作中尚不可能排除相关域外大国和集团的影响作用，但在个别势力利用亚洲固有矛盾不择手段搬弄是非遏制战略对手的今天，倡导亚洲在国际事务中树立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决定自己命运的自信，尤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在几乎呈多中心状态的亚洲地区安全合作现有条件下，应对明显日趋严重的地区性安全威胁，不成熟的亚洲安全合作水平面临严重挑战；与任何一种理论创新一样，中国领导人首创的亚洲安全观还需要一个理论充实和策略完善的阶段。在克服亚洲地区安全危机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亚洲安全观将经历认识的检验和实践的充实。

[收稿日期：2014-07-14]

[1]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521/c1002-25046183.html>.

跨境次区域合作与丝绸之路经济带^[1]

—基于地缘经济学的视角

肖 洋

[内容提要]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倡议,有助于搭建中国与亚欧国家经济合作的新平台。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覆盖的地区,自然障区面积较大,不利于宏观化的区域性开发,因此应注重中微观领域,从推进跨境次区域经贸合作入手,“以点带面”地推进整体开发。从这个意义说,“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是典型的跨境次区域合作。“次区域合作理论”是中国与中亚、南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论支撑。本文旨在从当代经济新区的开发规律来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跨国合作路径,关注基于边界的次区域经济区的培养,对国家间信任以及国际合作的助力效果。

[关键词]次区域合作 边境 经济新区开发 丝绸之路经济带

[作者简介]肖洋,博士,副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4)04-0022-11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是中国安全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实质上是

[1]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极地区国际组织建章立制及中国参与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14CGJ009),教育部国际司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研究中心2014年度资助项目(项目批号ASC2014YB05)的阶段性成果。

跨越边境的次区域合作,同时也是中国集“向西开放”与“创新型西部开发”为一体的综合决策。“中国-中亚经济区”与“中巴经济走廊”等理念的提出,反映出中国与中亚、南亚邻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强烈愿望。鉴于新区开发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核心动力,对大国崛起的支撑作用非常明显,因此,从战略层面审视中亚、南亚与中国西部边境省区的经济对接问题,评估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优势与成效,是合理规划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步骤的现实依据,同时也有助于构建实事求是的精细化政策体系。

一、经济新区开发规律与跨境次区域合作的理论基础

人们本质上具有不断拓展经济行为空间的需求,在其生活的领土空间的经济价值达到阈值以后,必然推动经济交往空间向外拓展。因此,对经济新区的开发与次区域合作行为相应而生。

(一)经济新区开发规律

经济新区的开发,是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所必然采取的一种空间形式。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各个阶段,无不包含着对经济新区的开发与拓展。通常而言,经济新区的开发,往往以成熟的经济老区为重心,并逐渐将经济活动拓展到老区的外围。在农耕时代,严酷的自然环境成为制约经济活动扩展的主要因素,但工业科技的飞速发展,为经济新区的开发提供了克服自然因素的条件。如今,经济新区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经济新区开发的核心动力是开辟工业原料产地。相对于农业而言,工业生产并不需要大面积的土地,而是采取集约型生产模式,通过运输通道将散布于自然界的矿山与消费市场链接起来。可见,工业化水平越高,就越是需要扩大原料的进口与消费市场,任何一个经济区的发展都源于此种内生动力。尽管经济新区与经济老区在生产水平与产品结构上不尽相同,但从本质上看,它们的生产力部门结构是一致的。概而言之,

工业时代的经济新区开发规律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在经济老区保持工业优势的同时,经济新区的开发以开拓原料产地为主。二是经济新区与经济老区之间存在正关联性,经济新区的现实优势取决于域内的资源是否为经济老区所需、是否具备外运条件,或者能否由本地加工。三是经济新区多偏重于原材料加工,其技术水平一般低于经济老区,两者是原材料与技术的交换关系。四是经济新区的开发较少受到人口压力的影响,主要需要技术型劳动力。五是经济新区一般位于大面积的陆地自然障区之中,其开发的地方只限于其中的局部非障区,因此经济新区很难成长为像经济老区那样的大规模工业集聚群落。

所谓自然障区,是指水热、地形等自然条件不利于人类大规模开发和定居的地区。^[1]近代工业技术的发展,虽然为障区工农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如新的水利开发、道路铺设等,但远远未能突破水热、地形条件对工业生产布局、人口集聚的限制,使得经济新区的工业开发仍然局限于水热、地形条件较好的局部非障区,经济发展规模有限。因此,在目前全球经济开发实践中,已经不再可能出现大片陆地面积的区域性经济整合进程,而是逐渐转向在小块非自然障区中的次区域开发。这既是由人类经济地理格局的现状所决定,也是地缘经济实践创新的必然趋势,并推动了次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发展。

(二) 区位、边境与跨境次区域合作

次区域合作的理论源于地缘区位(Geographic location)学,区位即场所、位置之意。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马隆·胡佛(Edgar Malone Hoover)指出,区位的特殊性在于:(1)生产要素流通的不完全性;(2)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3)距离成本的重要性。^[2]生产要素中的土地、能源和水资源等是不完全流通的,但资金和劳动力是可以流通的,其流通的

[1] 陆卓明:《陆卓明先生经济地理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页。

[2] E.M.Hoover,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4., p.11.

过程要受监管制度、利益主体、发展程度等多方面的制约。经济活动的分布表现出有序的集聚态势,并非杂乱无章地任意分配。空间位置因素需要考虑距离成本支出,经济活动受到距离的制约。正是以上三类要素使每一个区位表现出其不同于其他区位的特殊性。由此可知,边境区由于紧靠边界,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受到边界局势的影响,使之表现出独有的区位特性,因此产生独特的区域空间系统和经济结构。由于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不同以及对边界认知与重视程度的差异,传统地缘区位理论和新地缘区位学对边境区位的理解也就不同。

以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新地缘区位理论认为,贸易成本的降低和生产要素的互动,尤其是资本、人力的国际移动,能够改变区域的资源要素禀赋状况,使其经济活动的区位条件得到重新建构。^[1]李维斯(Livas)和福吉塔(Fujita)认为,在开放的行为体中,经济活动呈现出外向型区位特征。在这种形势下,边境区的经济功能地位提升,原有的国内核心城市区位对企业和人口的吸引作用相对下降,从而引发外资、人力、企业向边境转移,使整体区位的经济活力对比格局重新变化,跨境次区域合作得以实现。^[2]

根据新地缘区位理论的市场潜力模型,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在以往的公众认知中,边境地区产业规模小,人口少,通常属于经济活动相对较少的边缘区,但在新时期的经济背景中,边界战争冲突的可能性降低,边境地区的经济区位功能凸显,即经济发展有将边境区从国内的经济边缘区转化为跨国共同市场中心区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汉森(Niles Hansen)提出了“中心边境区”(Central Border Region)的理念。他认为,通过有效的地方支持和企业的活跃作用,能够激活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市场潜力,各国间跨边界贸易额将增长,能够吸引众多的企业和人力资源到临近国外市场的边境区聚集,在这种情况下,“边境区”最终将发展为

[1]Paul Krugman,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pp.1-2.

[2]Fujita,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Cities,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3.

“中心区”。^[1]维纳布尔斯(A.J.Venables)通过研究产业间互动的空间均衡,认为与跨边界的互动联络有关的经济活动存在空间集合的动力,边境区是集聚经济合力的靶区之一。而垂直联系的跨国公司向边境区位转移的可能性更大,大型跨国公司有可能成为跨境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力量。^[2]

由上述可知,新地缘区位理论高度重视边境地区在世界环境发生改变后的次区域合作的最新动态发展过程。这里的世界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国际形势和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相邻国家经济、社会、人员的紧密联系对边境区位经济功能的激活机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尽管面临自然障区的约束,但边境的区位比较优势仍十分明显,边境区有可能成为次区域合作的中心区。于是,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便应运而生。

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指若干国家接壤地区之间跨国界的经济人^[3]或法人,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在不同国家地理上相邻的边界间展开的协作活动。^[4]亚洲的跨境次区域合作又被称为“自然经济领土”或“扩展性城市区域”。1993年,亚洲开发银行认为“次区域合作包括多个国家精心设计的地理毗邻的跨界经济区”。^[5]1994年,新加坡边界区、马来西亚柔佛州、印尼廖内群岛之间三角地带构建了“跨境次区域合作带”。近年来,受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推动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经济互惠合作的重要指导方向。与传统的区域合作研究相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9月

[1]Niles Hansen,“Border Regions: A Critique of Spatial Theory and a European Case Study,”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Vol.11, No.1, 2007, pp 3-4.

[2]A.J.Venables,“Equi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6,Vol. 37, No.2, pp.341-342.

[3]孟捷:《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30页。

[4]李铁立:《边界效应与跨境合作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20页。

[5]ADB Annual Report 1993, Asian Development Bank[EB/OL]. <http://www.adb.org/documents/adb-annual-report-1993>.

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则更关注跨境次区域的合作，^[1]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2]中巴经济走廊等都是这类跨境次区域合作。因此，中国所倡导的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实质，是在尊重边界地区自然与人文条件的现实基础上，继承古丝绸之路的开放传统，吸纳新地缘经济学的区位理论，鼓励以点带面、从线到片，汇聚成一揽子合作，争取获得“1+1>2”的整合效应。^[3]

二、跨境次区域合作的优势与有效性解析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跨国经济走廊”是跨境次区域合作的不同表述，本质是使生产要素在次区域范围内达到自由流通，从而推动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通过国家间的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可以说，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提是中国与中亚、南亚邻国（巴基斯坦）之间的高度互信，通过政府支持、网络联系、过境需求、企业集聚等方式将边境的屏蔽功能转化为中介作用，挖掘边境区位优势，并以此带动跨境经济合作，将边境区由“边缘区”转变为具有发展潜力的“核心区”，增进其空间可达性与辐射力，达到双赢和多赢的目标。

这种基于各国实际国情的合作方式具有以下三大优势：

一是自然、人文领域的地缘优势。跨界区两侧山水相连，具有地缘整体性和延展性。如以河流为界，则多占据河流的上游或下游，以山脊为界，各自为南侧或北侧，基本上具有类似的地貌特征，还有相同的自然圈和人文圈。基于边界展开的次区域合作圈，通常属于相近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单元，具有经济合作的便利条件，有效降低了跨国合作的成本。

二是经济梯度转移的互补优势。地缘空间作用理论认为，区域合作

[1]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弘扬人民友谊，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

[2]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4年3月7日。

[3]崔启明：《白通社发表驻白俄罗斯大使崔启明接受专访实录》，《丝绸之路经济带》，2014年4月15日。

的强度随着空间距离的扩展而逐渐衰减。^[1]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跨境次区域由于在边界的两侧,具有空间上的邻近性,相互合作的强度往往较大,而随着空间范围的延展,其合作的影响力也就越小,所以次区域合作往往比区域合作更易取得成效。此外,地缘经济学认为,边境地区具有梯度延展势能,这是其独特优势。不同国家往往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梯度,占有不同资源要素,而边界区则作为不同梯度之间的过渡层与联系纽带,使得不同国家间经济上的互补性得以实现,生产要素的跨边界流动成为可能。

三是过境要素流通优势。随着核心城市群的发展,必然要求扩大过境需求,进而带来极富活力的要素流动,将促进城市群与边境区的协同发展。边境地区通常是各国经济联系的重要渠道,各国间的联系往往要借助边境地区的地利优势,因此,在当前各国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经济资源过境需求的增长也推动了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发展。

评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成效需要从中国与中亚、南亚邻国的经济合作现状入手。总体来说,中国与中亚、南亚地区的边境地区,自然人文条件较为恶劣,难以成长为大规模的工业城市群,而较为可行的是选择中微观的跨境次区域合作,这要比宏观的区域合作更易带来经济效益。以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其有效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机制灵活,合作成本较低。传统区域合作理论强调规范性和机制化,而跨境次区域合作则注重灵活性,不规定统一的制度形式。从边界两侧政治制度、经济构成和社会文化差异程度来看,次区域合作也可以分为“同质次区域合作”与“异质次区域合作”。^[2]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合作,要求相关国家让渡一部分的主权,并建立起超国家的管理机构。这意味着参与国在某些领域将受超国家机构的管控,这不符合亚洲国家主张经济合作不能干涉内政的传统理念,所以大规

[1] 闫卫阳:《城市空间作用理论模型的演进与机理》,《地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4期,第511页。

[2] 吴殿迁:《区域经济学》,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模、高层次、机制化的区域合作尽管初衷良好,但在亚洲获取的成效并不大。跨境次区域合作对参与方的制度硬性要求和超国家机构管理依赖并不强烈,又因采取自愿的原则,各国无须实施统一的制度、法律、规范,故而较易被各国接受。另外,跨境次区域经济协作不需要各国变动行政区划和管理制度,从而降低了双边与多边合作门槛,而且一旦某个区域内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取得成功,它的经验与收获就会很快外溢到其他地方。

其次,有助于推动边境地区的经济繁荣。跨国区域合作研究关注核心成员国的领导能力,而跨境次区域合作则关注边界省区的经济收益。^[1]通常而言,边境主要具有防卫与屏蔽功能,面临较大的安全风险,这使得边境地区往往是一国的经济欠发达区,受制于自然环境、人才、资金和技术的匮乏,仅靠原有资源难以提高其区位竞争力。此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新疆、云南、广西等边界省份应该发挥充当开拓国外市场的桥头堡的区位优势,但由于自身积累薄弱,只有从境外引进资金与资源,才能激发本地区的经济活力,形成经济集聚。此外,跨境次区域经贸合作不歧视非成员方,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不论是边境区间经济行为体的互通有无,还是邻国企业集团在东道国边境地区的投资与商贸行为,边界的两侧都是开放式的经济活动空间,并且鼓励其他国家参与到合作之中。

第三,具有可持续发展动力。在跨境次区域合作中,以地方政府、企业为主导的功能性一体化效用十分明显。地方政府是推动跨境次区域经贸合作的重要力量,能够对次区域合作起到扶持和协调作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涉及跨境双方、多方不同部门的合作或生产要素领域的流通,这需要各国政府职能部门的相互协调。当然,“丝绸之路经济带”、跨境经济走廊的建设,最终决定权仍然取决于国家的态度,需要国家提供各种配套项目支持。

最后,具有外溢效应。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推动生产要素

[1]Asian Development Bank,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 Manila: Philippines Press, 2012, pp.7-8.

的越境流通。跨境次区域合作促进了边界双方、多方的信息交流、人员互动、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降低了跨越边界的交易费用。当前中国的边境省份日益成为重要的经贸口岸和人员流动要道。第二,激活了边界省区的发展活力,并以点成面,由线到片,带动整个区域发展。^[1]随着中国与邻国关系的改善,原来处于“动荡之弧”的边境省区反而日益成为促进跨国经贸合作与维护共同安全的枢纽,成为扩大次区域双边与多边经济、人文、社会交流的重要平台。第三,促进国家间战略互信。在跨边界次区域合作中,成员之间的非层级关系使成员心理需求得以满足,提升了成员国参与跨边界交往的积极性,且对合作目标的实现、合作效率提升发挥重要影响,从而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水平从互通到建立协作关系,再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级,巩固了双方的战略互信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已经由比拼核心城市群,逐渐过渡到探求经济增长带的新阶段,因此,有效利用边境省区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国获得比较优势的新导向。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可持续动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某个区域的利益独享地带,而是跨国界的利益共享地带。旨在将安全互信、地理毗邻、经济互补的优势转化为切实合作、共同发展。随着国际安全局势的整体缓和,国家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变,边界的经济功能得以激活。国家为促进跨境共同发展,给予次区域合作以空前的重视;地方政府出于刺激经济发展的考虑,主动推进跨边界合作;企业的跨界互动也日趋频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必然推动民族国家的边界由“政治封闭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而其可持续动力则来自于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

第一,跨境次区域合作的主导力来自国家。在国家整体经济规划下,跨境次区域合作将推动边境省区人口职业的变化、发展模式的调整与产

[1]柳思思:《“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新进路》,《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第26页。

业结构的优化,使其经济发展战略从内向转为外向,从封闭转为开放,从进口导向转为出口导向。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是时代主题,边界对生产要素和贸易互动的阻碍作用日渐减弱,成为不同国家物质、信息交流的中介面,并具有一定的“过滤功能”,即边界对于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产品、资本、信息的流动是开放的,而对于损害其发展大局的流动则是屏蔽的。^[1]

其二,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推动力来自地方政府。边境地方政府是跨境次区域合作的首要获益者。边境地方政府借助跨边界合作,可以扩大市场规模,有利于边境区位企业的发展,边境也成为内陆企业拓展国外市场的前沿地带。例如在中国与中亚、巴基斯坦的次区域合作中,新疆就发挥了一个桥头堡的积极作用。

其三,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活力来自企业。能否成功产生企业集聚效应是评估次区域合作成效的重要标准。^[2]在跨境次区域合作中,一方面跨境合作必须依赖于企业参与才具有活力,另一方面,跨境合作的建设又能促进企业的发展与规模化成长,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企业通过引进与外销、竞争与合作、探讨与学习,进行技术转移与创新活动,企业通过与客户、供应商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联系,推动跨境次区域合作的纵深发展,为国与国之间建立经济联系奠定了基础。

根据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的规划,“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不同建设阶段所需的推动力量不尽相同。在初始阶段,依靠国家间战略共识的外力推动。由于邻国边境区或是在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与中国具有相似性,或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共识,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作出一系列制度保障与政策安排。在成熟阶段,依靠地方政府与企业集群的自生性推动力。当“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信息采集成本和交易成本均可降低。在边境

[1]李铁立、姜怀宇:《边境区位、边境区经济合作的理论与实践》,《人文地理》2004年第6期,第3页。

[2]刘蕊萍:《中国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35页。

两侧地方政府的协调下,降低供求双方的选择费用,逐渐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的自发性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动力机制之外,以下三个因素也应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整体规划之中。一是地缘安全环境。稳定的跨国地缘安全环境是拓展国外市场和利用邻国资源的前提。因此,需要关注跨境区的地缘安全环境与世界地缘安全格局的变化态势。二是空间可达性。跨境次区域合作是一国经济新区的拓展,因此要考虑跨境地区与国内经济老区在交通、通讯方面的联系便捷度,并思考国家间合作规制落实在边境地方政府的可达度与执行度。三是市场交易成本优化。一方面要鼓励投身于跨境次区域合作的企业,给予税费适当减免等优惠;另一方面要完善边界区的交易制度,激发其经济功能,提升其经济地位,为企业跨境合作提供便利,以达到跨边界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代表的跨境次区域合作,为中国和西部邻国创建了新的合作平台,推动“物流走廊”、“能源走廊”、“人文走廊”的综合性发展,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快速发展。跨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应遵循经济新区的开发规律,寻求独具地方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采取多元化的合作方式,发挥边境地区的中介作用,进而带动其他次区域的参与式发展,因此,整体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总而言之,随着亚洲经济整合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古丝绸之路沿途各国被赋予新的历史机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愿,将再次出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史册中。

[收稿日期:2014-06-09]

值得永远传承与创新的国际关系原则

—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 60 周年

周士新

[内容提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过了一个甲子的历史岁月,仍焕发着强大吸引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特别强调互不干涉内政,体现了国际规范发展的现代性特征,适用于处理各种相同或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外交需要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本质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外交任务和战略布局的转型,发展与时俱进的新型国际关系,重视共同协商治理全球性问题,维护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互利共赢的发展共同体,谨慎处理功能性主权让渡的问题。中国需要不断充实与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与外延,解决其在实际运用中的制约困境,增强其规范国际关系的普适性。为此,中国需要增强大局意识与战略文化,培养正确的义利观,并始终坚持战略创新,积极稳妥地参与解决涉及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等问题的有效解决。

[关键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互不干涉内政 外交转型 战略布局

[作者简介]周士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大国外交室主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4)04-0033-11

2014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 60 周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经时代的实践考验,已经成为国际普遍公认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成

为建立和维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稳定与发展的战略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坚持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国际间的平等合作,推动了中国同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政策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国际体系之中,并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道共同促进了国际体系的转型发展。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责任的期待和担忧的声音都在增长,国内社会对中国自身实力与国际地位的非对称性也相当不满。中国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满足中国对内与对外政策的双重需要,已经成为中国外交亟需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历史传承与精神本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既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也体现了正确处理当时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遏制政策的不断推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以及中国恢复发展经济对和平环境的需求,开始在周边推行睦邻友好外交。^[1]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发表联合公报,签署协定,提出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中印两国都高度认可并愿意遵守这一原则,充分说明了这一原则是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的。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缅甸友人时表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2]1957年,

[1]范宏伟:《中缅关系的转折:1954年——以外交部解密档案为视角》,《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5期,第92页。

[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

毛泽东在莫斯科向世界宣示：“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1]新中国领导人进而将本来用来指导不同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以推广，而用于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的关系，将国际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独立身份和无产阶级联盟成员身份，通过他们对完全平等的共同追求而实现协调统一。^[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所有国家之间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体量规模国家之间的关系，^[3]无论是大国与小国，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还是不同文明的国家都有必要与可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不仅要坚定不移地把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立足点，力争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国家在国家关系上相互尊重、共同发展，而且要继续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各种国际会议，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支持和声援，进一步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4]

邓小平在总结处理国家间关系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新形

[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2]朱丹丹：《革命理想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新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准则的历史联系》，《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50页。

[3]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69582.shtml

[4]李慎明：《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及实践的几点辨析、概述和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30页。

势创新与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成为中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指导方针,既适用于处理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处理社会制度相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是根据五项原则的精神,提出党与党之间建立新型关系的主张,并倡导“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发展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三是提出妥善处理国家间意识形态差别的战略思想,主张“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四是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发,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即有关国家应彼此尊重、互让互谅,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对一时难以解决的岛屿之争,应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避免冲突。^[1]邓小平在判断和平与发展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的基础上,提出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尊重各国的主权和发展权,尊重它们的经济独立,尊重它们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实行社会经济改革、管理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的自主性,坚持各国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平等性,公平分享应得的权益,履行应尽的义务;坚持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反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坚持改变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结构,改变不合理的旧的贸易格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是互不干涉内政,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主权一律平等,而霸权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恰恰是依仗强大实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干涉别国内政。在国际社会中提倡以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推动多极化局面早日形成等,都是对霸权主义的制约,也是更有效、

[1]马振岗:《中国外交的伟大变革》,《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第2页。

[2]马加力、崔燕生:《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40周年》,《现代国际关系》,1994年第6期,第5页。

更实在的反霸途径。^[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主张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的,得到了联合国大会的回应和支持。首先,关于和平共处的战略理念,《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3款就提出各国需要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其次,关于互不侵犯的政策原则,《联合国宪章》第2131号决议表示,“任何国家,无论为任何理由,均无权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外交,故武装干涉及其他任何方式之干预或对于一国人格或其政治、经济及文化事宜之威胁企图,均在谴责之列。”^[2]最后,《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第1款和第4款、第十二章第七十八条都对主权平等原则和各国维护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作出了明确规定。

中国倡议发起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规范的一般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发展阶段,也反映了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和中国一样,高度认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政策主张,并将之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原则。

中国外交任务与战略布局的转型

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本质,有效应对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遇到的国际与国内的各种挑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外交任务转型的迫切要求。从任务转型上看,中国外交正逐渐从重视发展双边关系向建构多边关系、从国际问题和周边问题到全球性问题、从短期热点问题到战略常态问题、从国家行为体到国际行为体、从高政治问题到低政治问题的态势转化。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利益边界已向全世界扩散,中国外交不仅要处理与自己直接相关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国家一道介入与自己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国

[1] 曲星:《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现实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1期,第15页。

[2] “大会1965年12月21日第2131(XX)号决议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http://legal.un.org/avl/pdf/ha/ga_2131-xx/ga_2131-xx_c.pdf。

际和全球性问题。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情况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将是 中国实行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原则,规范中国外交任务成功创新的指导思想,促进中国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转型的法理基础。

第一,有利于发展与时俱进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也是与其他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相互关系不断演进与变化的过程。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为了避免新形势下的国际关系对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希望国家之间能够避免恶性竞争、冲突甚至战争,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和谐相处。从这方面来看,新型国际关系是所有国家都希望实现的一种结果,是相互间的利益交汇点,是各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未来趋向。因此,中国需要重视与其他国家要加强基于共同利益、共同责任为基础的多边合作,增进相互信任,遵循在国际法和各国普遍运用的国际规范进行协调、沟通,妥善解决分歧与问题。同时,中国与新兴大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会积极地本着互惠互利原则,求同化异。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需要一如既往地注重为双方带来经济效益,允许他在政治理念等方面存在不同看法和意见。^[1]

第二,有助于推动共同协商治理全球性问题。中国参与治理全球性问题可使中国增强协调与其他国家关系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能力,同时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可以通过更多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减轻守成大国承担的治理全球性问题的重担和压力,建立并夯实相互合作的方式方法,为在更多领域中更多问题上进行协调奠定基础。全球治理的软机制和规范更具开放性,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合作提供更大的政策和行动空间。中国可以强调国际治理机制不仅仅是平等性,而且更需要公平性。发达国家不应再要求欠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承担与强国、富国同样的责任,而且大国也理应援助小国。中国重视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多边平台的作用,展示中国作为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更为积极主动的正面形象。^[1]

第三,有益于维护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和平与安全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助于为中国持续性高

[1]赵可金:“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思想库, <http://think.sifl.org/?p=4560>。

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离开中国的积极、广泛而深度地参与,并为其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有助于建立互利共赢的发展共同体。中国和平崛起并不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中谋求霸权,更不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中国和平崛起是与其他新兴大国不断发展同步进行的,相互之间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共同目标是通过共同发展实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化日益深刻影响各国互动方式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都在寻求通过相互或共同关系便利化实现互利共赢。互利共赢不仅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缩小南北差距,而且有利于新兴大国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通过生产工业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途径,缩小与守成大国的差距。各国共同发展是促进人类共同体的基础,而人类共同体意识也有助于各国平衡本国利益与外国关切,在公共发展中建立更加平衡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1]

因此,未来的中国外交要学会在如何维护核心利益不受伤害的前提下,与其他国家协商实现公平公正合理地共同自愿让渡一些功能性主权,特别是在处理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要实现主权让渡内容与程度、付出与收益的平等性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性。^[2]中国强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与其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全面合作,构建新的国际安全新秩序。中国不仅需要关注国家利益,而且要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化时代应对国家行为体难以发挥作用的问题中的重要性,切实将两者的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实现全球治理与国际治理的叠加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补充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应用。此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仅限于处理主权与安全问题,而且涉及如何促进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问题。互利共赢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2]路本龙:《论全球化时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代亚太》,2004年第6期,第14页。

了国家间为何能合作,怎样合作以及合作结果的问题。可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应中国外交任务转型的需要,是促进中国在不断崛起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相互协作的主导战略思想,有利于为世界和平、安全、稳定、发展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演进前景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符合《联合国宪章》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规范,其内涵与外延都比较广泛,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充实与发展。然而,在长期的战略实践过程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而难以顺利实行:一是有关各方是否存在利益的共同点,这是合作的基础与起点,也是维持合作的重要纽带。有关各方如果存在共同的威胁或敌人也可能建立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甚至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强调的是各国维持合作的开放性与可延续性。二是有关各方的力量对比是否处于一种相对的均衡状态。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间功能的相似性与能力或实力的差异性存在的矛盾会促进各国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或状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之不同,它打破了“强权有理(Might makes right)”的霸道逻辑,强调从维护现代国际关系的立场,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公正化。三是有关各方是否存在求同存异的主观愿望和行动。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习俗等不同决定了各国国情的多样性,这与地缘政治、文明价值等因素一样塑造了各国对待其他国家的规范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的则是国际关系中的最大公约数,体现了各国的共同特征,并不是强调要通过强力消除个别国家的特殊性。四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大环境,也就是各国是否愿意同意使用相似或相同的规范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在同一个国际大环境中,各国都应具有“利益攸关方”的意识,从而以负责任的态度主动承担或要求其他方承担适当处理相互间关系的重任。然而,无论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或不是处于同一个国际大环境的国家都难以利用相似的规则来约束

对方,只会让各方陷入你争我夺,甚至你死我亡的竞争或冲突状态。^[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需要增强其规范国际关系的普适性。为此,应做到:一是将和平共处作为国际关系的立足点,逐渐上升为和平共生与和谐共生。中美当前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和平共处的精神,说明两国接触已经扩及全方位和多层次,但仍停留在比较低级的层次,存在较大的升级空间。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适应全球治理规范形成的挑战。近年来,全球治理应对的主要是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危机、资源短缺、疾病蔓延、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经济安全、非法移民、走私贩毒、有组织犯罪、海盗、洗钱等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具有强烈的跨国性特征,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防止或应对的,往往要求国际社会协同和协商,共同努力才能真正产生效果。这样,片面强调主权独立有可能会贻误问题的解决。如何在既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又合理共同让渡国家主权已经成为各国对外政策的艰难选择。三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需要适应新干涉主义、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责任等新规范的挑战。人权和主权孰大孰小、孰高孰低、孰前孰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争执的热门话题,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许多国际准则往往在这方面也含糊其辞。以人道主义为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甚至侵略其他国家,无论如何是与国家主权至上原则相悖的。然而,国际社会也决不能容忍任何政府以保护主权为名滥施违背人道主义的政策,也不愿在某些国家内部出现反人道主义行为时而坐视不管。四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确保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衡量标准。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上升迅速,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道正成为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使部分国家担心中国未来会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政策。因此,能否长期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会成为霸权的重要标准。

对中国来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意味着要增强大局意识与战略

[1]赵伯乐:《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条件论析》,《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页。

文化,培养正确的义利观。当今的世界早已不再是“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敌友分明的状态,而是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向多样化的统一发展,走“和而不同”的道路。^[1]中国的外交布局也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框架,从建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感同身受的第三世界外交和平等互利的多边外交等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或地区组织建立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和综合性的协作关系。中国快速崛起不仅意味着实力与能力的增强,也意味着权利与义务、地位与责任、机遇与挑战并行增长,要求中国培养起大度与坚定、宽容与忍让相济的战略品质,把握和坚持战略方向,不为一时一事而轻易改变自己的战略决策,循序渐进稳妥地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外交应以义利兼顾和义利平衡等传统观念为基础,实现“义利协调、以义为先”,在维护不断增长和扩展的国家利益时,更积极地声张和主持国际正义,增强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外交需要不仅将国际责任和贡献转化为软实力,而且将塑造国际体系转型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国际正义的参考标准。义利兼顾不仅意味着义利合一与并重,而且要根据具体情况兼顾二者的不平衡情况,坚持“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为原则,决定衡量正义与利益的分配问题,以及二者如何实现相互转化,在维护国际正义的过程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战略创新。中国陆上边界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加之周边部分国家对我海洋主权的侵蚀日趋严重。中国外交既需要维护积极有利的周边环境,又需要妥善解决主权争端问题,实现各方都能接受的互利共赢。中国需要在协作应对全球性问题中强调共同责任观。以协调、协商为基础促进合作,有助于增强中国主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增进“休戚与共”、“见危授命”的参与意识。中国外交可以从战略角度出发,提供开放包容的国际公共产品,培养、建立并夯实相互合作的习惯,引导各方在更多领域通过共赢方式来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中强调共同利益

[1] 梁守德:《浅谈中国的新国际观和外交战略的新思维》,《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第6页。

观。中国积极、广泛而深度的参与国际合作,有助于国际社会持久和平与发展。中国既要保持克制与超脱,避免无谓地被一些国际热点所牵制,甚至给国际社会留下霸权与干涉者的形象,也要站在主持正义的角度,以中性与理性的政策,根据客观事实,充分照顾各方利益与关切,与利益相关方谈判解决历史与现实问题。

结 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经洗礼与磨练而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充分体现了当前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利益。然而,作为外交理念和规范的总结,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要求外交政策必须适时调整,以保证外交活动的成功,^[1]因此,外交决策层与执行者要灵活与适度地把握好这一原则的实质与外在表现之间的关系。中国积极介入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会越俎代庖地代表任何一方进行谈判,或代替任何一方做任何承诺,^[2]而是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与和平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维护国际秩序和规范的权威。总体来说,国际关系民主化应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的具体体现,^[3]中国是努力推动这一进程的建设性力量,乐意与其他国家一道为实现国际公平与正义做出自己的贡献。

[收稿日期:2014-05-06]

[1]赵伯乐:《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条件论析》,《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4期,第13页。

[2]曲星:《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现实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1期,第18页。

[3]门洪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第10页。

冷战后日本的地缘政治思想^[1]

葛汉文

[内容提要]对日本战前“地缘政治学”的反思及“海洋国家论”的泛起,是冷战后日本地缘政治思想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主张巩固与美国等“海洋国家”的同盟关系,加强对中国等“大陆国家”的遏制防范是其重要推论。冷战后日本地缘政治研究在总体上依然没有超越经典地缘政治范畴,对权势对抗、空间争夺的迷信和对意识形态对抗的渲染是其主要的理论风格。冷战后日本地缘政治思想对当前日本对外战略的制订与实践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日本 地缘政治 对外战略

[作者简介]葛汉文,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4)04-0044-17

日本地缘政治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 20 世纪初叶日本便出现了一批翻译介绍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马汉(Alfred T. Mahan)以及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等西方名家的著作。上世纪 30 年代之后,以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引起了日本政军界和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日本加速步入

[1]本文系 201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冷战后世界各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特色及其国际政治意义研究”(批准号 12CGJ022)的成果之一。

军国主义道路背景下,包括小牧实繁、饭本信之、上田良武等人在内的部分日本学者,在深入研讨德国地缘政治学机理、信条和主要观点同时,致力将日本自身的文化-政治传统、侵略扩张野心与现代地缘政治理论模式相结合,力图创立出一种与西方有别的“崭新的日本地缘政治学”,从而为日本国策奠定“理论基础”。^[1]在军国主义势力的资助和鼓吹下,这些学者的研究受到日本军政界的高度关注,发展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一系列重大对外战略的理论依据或政策注脚,最终随着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一并遭到了彻底毁灭。二战结束后,鉴于地缘政治研究在日本疯狂侵略政策形成和实践过程中扮演的丑恶角色,小牧实繁等一大批地缘政治学者被“公职流放”,日本地缘政治研究步入“末路”。^[2]

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春名干男《核地缘政治学入门》、太田晃舜《海洋地缘政治学》和河野收《地缘政治学入门》等一大批著作的面世,开启了地缘政治研究在战后日本复兴进程的序幕。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日本国际环境的大变动,日本当代政治-知识精英紧密围绕21世纪的国际形势、日本的国家定位与对外战略展开了激烈讨论。在这场大论争当中,以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缘政治》和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两书日文版分别于2005年和2008年再版为标志,地缘政治在当代日本政学界又呈流行之势。在全球地缘政治研究大复兴背景下,很多日本学者或是通过对日本战前“地缘政治学”的回顾和反思,致力于分析揭露其历史根源、基本逻辑和实践恶果,以期得出相应的“总结教训”;或是鼓吹从地理与历史相结合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21世纪初期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从而为日本未来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和可用手段做出应有筹划。地缘政治研究在冷战后日本社会的再度兴起,极其深刻地体现出当前日本国内集体心态发生的剧烈变动,其部分观点结论已经转化成为当前日本对外战略的组成部分,值得引起我们

[1]小牧实繁:《日本地缘政治学宣言》,弘文堂,1940,16-17页。

[2]村上次男:《日本地缘政治学の末路》,载《空間・社会・地理思想》第4号,1999,第50页。

的高度关注。

一、对战前日本“地缘政治学”的回顾和反思

早在冷战时期,日本政学界便出现了一股研究反思日本近现代扩张思想与实践的思潮。在这一时期,包括饭本信之、村上次男、石井素介等人在内,很多战前参与日本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回忆文章,对战前日本“地缘政治学”的源起、逻辑、主要观点及其与军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检讨。1972年,日本自民党海空技术调查会编写的研究报告《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明确提出了“深究”日本“地缘政治学”的要求。报告中指出,无论是以小牧实繁为代表的“皇道地缘政治学”或是以饭本信之为重要成员的“日本地缘政治协会”,日本战前的地缘政治研究主要受到了以豪斯霍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强烈影响。也正是在其影响下,日本军部提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在与大陆国家德国结盟同时,与英美等海洋势力正面为敌,是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1]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部分日本年轻一代的学者在吸收当代西方地缘政治研究新观点、新精神的基础上,对战前日本“地缘政治学”展开了颇有新意的反思。^[2]在对地缘政治学本体论、方法论等“元”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后,这部分日本学者指出,地缘政治学自身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逻辑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就是其“随意性”和“权力性”。尽管地理学自身具有无可争议的科学性,但当被用于政治用途时,它却成为“政治取向的奴仆和证实权力需要的工具”。在地缘政治学

[1]海空技术调查会:《海洋国家日本の防卫》,原书房,昭和47年,第4、26、73页。

[2]当代西方地缘政治研究的新发展及其诉求,参见葛汉文:《批判地缘政治的发展与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4期,第42-48页;葛汉文:《冷战后西方地缘政治研究的进展、问题与启示》,载《国际论坛》2013年第3期,第1-5页。

家的论证过程中,地理概念有时被轻视,有时被过于重视,而地缘政治研究也因此成为了一种“伪造的地理”,成为了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推波助澜。在此过程中,“参与国政之士将国际政治进行了‘空间化’解读,特定的事件、特定的人物都被打上了空间印记,特定的空间也因此被赋予了非地理的属性”。而正是这种通过空间角度“将己方、他方相分离”的行为,导致“帝国主义式的”国际政治实践的出现,这正是地缘政治学的“危险性”所在。^[1]

基于这种逻辑,这些学者相信,战前日本“地缘政治学”步入歧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最基本的学术前提就是本着改变所谓“被欧美歪曲的世界秩序和势力划分”的目标,为建构“大东亚共荣圈”这种“日本式的世界秩序”提供理论证明。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所谓“皇道地缘政治学”就是“希望通过地志学研究以建立反西方的世界观,用抽象的‘皇道’概念来弥补理论上的不足”;而日本地缘政治协会则力图通过地缘政治学方法来研究日本在陆上和海上的势力范围,希冀建立一个“高度国防的国家”。正是在这种“权力性”的支配下,战前日本的地缘政治研究者在日本国内社会扩张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氛围中和军部的后援下,将自己掌握的地理学知识“随意地”塑造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战略指南,完全失去了对世界情势“冷静、客观”的判断力,结果“直接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败北”。^[2]

在这些学者看来,地缘政治学自身存在逻辑缺陷及其实践恶果还不止于此。日本学者佐藤健就在借用美国当代地缘政治学家阿格纽(John Agnew)及奥特瓦塞尔(Gearóid ó Tuathail)的观点后指出,尽管地缘政治的学术发展在二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似乎陷入停滞,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地缘政治学依然对战后国际格局的演进发挥强烈影响,美国等

[1]佐藤健:《日本における地缘政治学思想の展開 - 戦前地缘政治学に見る萌芽と危険性》,载《北大法学研究科ジュニア・リサーチ・ジャーナル》第11号,1999,132頁。

[2]村上次男:《日本地缘政治学の末路》,载《空間・社会・地理思想》,第50頁。

西方国家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们依然在使用地理知识作为其权力欲望的辩护词。而冷战也仅仅是一种为了权力目的而唤起的“意象和意象的对峙”。在抵制“共产主义势力全球空间扩张”的口号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政治词汇的对立，开始被赋予了单一化和意象化的地理空间意义，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之间对立和争夺也因此被赋予了“现实”的物质标尺。^[1]

这些日本当代学者尽管在反思战前日本地缘政治学的教训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依然认为该学说有其“积极”作用。在他们看来，战前日本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对战前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反抗勇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小牧实繁等人对“欧美主宰的世界秩序”和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抨击和以及重建所谓“大东亚秩序”的构想，其实质是以一种“亚洲-太平洋秩序反对西方中心秩序”。这种战略转变，体现出日本社会精英阶层已经从较早的“脱亚入欧”心态向追求日本“特殊道路”方向发展，这体现出亚洲民族“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勇气”，甚至还应当被视为“多元世界观”和“亚洲一体化”观念的先声。^[2]

当前日本部分学者对战前日本地缘政治学的反思，明显吸收了流行于当代西方学界的“批判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的逻辑观点。他们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对包括战前日本地缘政治学在内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研究中的物质决定论倾向，揭露了战前日本“地缘政治学”隐藏其中的价值取向和真实动机。应当承认，这一点对于日本地缘政治研究打破思想枷锁、修正错误倾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当前日本学者对战前日本地缘政治研究的反思仍然是极不彻底的，立场和方法都存在严重问题。他们虽然指出

[1]佐藤健：《日本における地缘政治学思想の展開戦前地缘政治学に見る萌芽と危険性》，载《北大法学研究科ジュニア・リサーチ・ジャーナル》，第133頁。

[2]Yamazaki Takashi, Takagi Akihiko, Kitagawa Shinya and Kagawa Yuichi, “Reemerging Political Geography in Japan,” Japanese Journal of Human Geography, Vol.64, No.6, 2012, p.550.

了战前日本“地缘政治学”在逻辑方法上存在的致命问题,但对于小牧实繁等人的政治动机却进行了辩解和美化,仿佛日本战前学者为日本疯狂侵略政策进行的理论辩解,仅仅是“目的正义、手段失当”而已,完全无视军国主义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及在“解放亚洲民族”口号下对东亚各民族犯下的血腥罪行,这一点无疑需要引起我们格外警惕。

二、重返“海洋国家论”

在对日本战前“地缘政治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许多日本当代学者却对日本战前另外一种地缘政治思想倾向即“海洋国家论”表示出了极大的好感。早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日本大陆扩张野心极度膨胀之时,战前日本海权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前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便提出,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日本必须放弃大陆扩张的企图,转而利用天然的、极具优势的地理条件,依靠海上力量之强大谋求国家权势的增长。^[1]尽管佐藤等人的观点很快就在陆军、长州阀和大陆扩张论者的联手打击下销声匿迹,但随着日本疯狂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毁灭,战前佐藤等人要求克制陆上扩张、加强海上实力的观点很快就重新得到了战后日本学者的积极评价。

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佐藤铁太郎、秋山真之等人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有关发展海权的论述,再度成为当代日本学术界重新认识战前日本地缘政治研究努力的关键组成部分,“海洋国家论”也由此在日本知识界得以迅速流行。^[2]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著名学者、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在其提出的“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当中,就用几乎与佐藤相似的语句描述日本在亚洲的政治区位:“日本的边疆是浩瀚的海洋,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海洋国家,日本

[1]麻田真雄:《歴史に及ぼしたマハンの影響》,载《マハン海上權力論集》,岩波文庫,2010,第 15 頁。

[2]渡辺利夫:《海洋国家同盟論再論 - 日本の選択》,载《環太平洋ビジネス情報》第 8 号,2008,第 7 頁。

的未来在海洋”。^[1]1978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总结日本近代的“经验教训”后更是明确指出:“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日本是个海洋国家。”而日本一旦忘记或抛弃自己的海洋国家身份,基本上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在历史上无论是唐代的白村江之战、明代万历的朝鲜之役,还是近代以来的对华战争都是如此。而二战中日本试图占领大陆并与大陆国家德国结盟的结果,更使日本最终走向败亡。因此,日本必须牢记这一历史教训,坚定地走海洋国家之路。^[2]

在冷战后日本“海洋国家论”兴起的进程中,最有名的推动者之一当属包括当时日本政界、学界、经济界、舆论界的代表人物所参加的“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该论坛于1998年4月至2002年1月出版了《日本的身份: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的日本》、《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到海洋国家》以及《21世纪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世界秩序与地区秩序》等系列报告,详尽地描述了当代日本政治-知识精英对日本及其所处的世界地缘政治观点,在日本国内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3]在这些学者或政治家的眼中,作为一个为鄂霍次克海、日本海、东中国海和太平洋所围绕的岛国,日本位于所谓“欧亚大陆中心区边缘地带”,它既是“海洋国家的枢纽,也是边缘地带的连接点”。这一独特的地缘政治属性直接决定了日本对外战略的根本属性及未来的可能走向,即主要作为一个海权国家发挥地缘政治作用。日本完全应当在将周边海洋作为“天然屏障”和“安全上的优势”的同时,凭借其拥有的通达世界各地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优势发挥全球影响力。因此,“从外交战略的观点看,日本与其向大陆扩张,不如重视海上权力”。^[4]

[1]高坂正堯:《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央公論社,2008,第250頁。

[2](日)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金苏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第135頁。

[3]初晓波:《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95頁。

[4]Akihiro Iwashita, “An Invitation to Japan’s Borderlands: At the Geopolitical Edge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Vol.26, No.3, 2011, p.279.

在肯定日本地缘政治属性的基础上,这些日本政治-知识精英将日本实现生存、发展乃至成功的对外战略放在强化与其他海洋国家联盟、维护所谓“基于海洋价值观的世界秩序”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很多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非政府智库,便在鼓吹日本所谓“海洋国家属性”的基础上,对日本所应采取的对外战略进行了细致的筹划,鼓吹日本国家安全的基础在于“绝对不能离开‘海洋国家群’”以“应对来自‘大陆国家群’的威胁”,而美日安保同盟就是“全球性海权和地区性海权的合作”。^[1]冷战结束后,部分日本学者更是在总结日本近代历史后“发现”:日本每当与海洋国家结盟、警惕大陆国家扩张便能够取得繁荣,而每当与大陆国家结盟或者执行大陆扩张政策就要失败。1904年日本通过与海洋国家英国结盟并得到美国的支援,击败了大陆国家俄国;一战中,日本作为英、美等海洋国家的盟国,击败了大陆国家德国;但日本在二战中选择与大陆国家德国结盟、与英美等海洋国家为敌的结果,却惨遭失败。战后日本的再度振兴,归根到底也源自日本与海洋国家美国的结盟,这是日本在冷战期间维护自身安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保证。正是通过这种正反两方面的历史论证,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日本决不能重走大陆扩张或与大陆国家结盟的道路,而应牢记历史的教训,与大陆国家保持距离,走海洋国家之路。在此基础上,这些学者对当下日本必须坚持的对外战略筹划就是:在继续加强与美国同盟关系同时,推动建立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东盟国家在内的海洋国家联盟。“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日本就实现了名副其实海洋国家的历史使命”。^[2]

但这些学者在审视二战以来日本的对外战略后特别“遗憾”地指出,在二战结束后的很长时期里,战后出生的大多数日本人都力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的过去”,在地缘政治想像上仅将日本定义为一个

[1]段廷志,冯梁:《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历史演变与现实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1期,第70-71页。

[2]渡边利夫:《海洋国家同盟論再論-日本の選択》,载《環太平洋ビジネス情報》,第7頁。

包括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等四个岛屿及周边诸小岛的狭小国家。与之相类似,日本对外战略决策者也从未将日本的海洋安全和海洋利益置于战略制订的核心位置,相反在宪法第九条“和平主义条款”的“约束”下,宣布放弃战争、不保留武装力量,在安全问题上严重依赖美国,而集中关注经济发展。尽管这一战略在冷战期间基本是成功的,日本得以置身于欧亚大陆军事对抗之外,专注经济发展,保持和平态势;但随着冷战后地缘政治形势的改变,日本紧邻的东亚大陆在总体进入相对和平稳定轨道同时,以中日钓鱼岛归属纷争、中韩独岛(竹岛)争端、中国南海岛礁争端、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为代表,东亚海上争端却愈发激烈。在这种形势下,那些致力于鼓吹“海洋国家论”的日本政客和部分学者感到特别“痛心疾首”的是,在急剧变动的地缘政治面前,大多数日本人依旧没能意识到日本当前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面临的“威胁和挑战”。

“海洋国家论”作为当下日本最为流行的地缘政治理论之一,对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转型具有强大的影响。冷战结束之初,日美同盟的存在价值一度因苏联的解体和共同敌人的消失而受到了日本部分政学界人士的置疑,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日本还谨慎地拒绝派遣海上自卫队参战而以财政支援的方式为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支持,试图继续坚持冷战时期的“免费搭车”(free-riding)战略和“支票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政策。^[1]但以1992年日本通过《国际和平合作法》将海外派兵合法化为标志,日本政界保守势力借重新定位并持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为手段伺机扩张日本海权的趋势愈发明显。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以1999年通过的《周边事态法案》为依据,开始对日本海上自卫队能力、使用原则和使命进行重新定义。特别是2001年日本通过向印度洋派遣海上自卫队协助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事,以及2003年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参战等举动,大幅提升了其在美日军事同盟当中、特别是海上军事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本开始以远超以往的态度参与远洋军事

[1]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 Holmes, “Japan’s Emerging Maritime Strategy: Out of Sync or Out of Reach?”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27, No.1, 2008, p.31.

行动,日本的海洋战略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1]

三、遏制防范“大陆国家”

“海洋国家论”在极力鼓吹“坚守”自身海洋国家属性及与其他海洋国家结盟战略的同时,如何应对所谓“大陆国家”的问题是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推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和平发展,在当前日本政学界的主流观点当中,中国已取代了前苏联,成为当下日本必须警惕的、处于“海洋亚洲”之外的“大陆国家”的代表。在不少日本学者和政客的不无恶意的描绘下,中国被逐步塑造成为一个处于海洋国家及海洋文明对立面的“大陆国家”,具有迥然不同的地缘属性和行为方式,其近年来对亚洲大陆外围海洋空间的“不断扩张”已经成为日本维持安全与繁荣乃至东亚地区实现和平稳定的“主要障碍”。以这种思维倾向为基础,“海洋国家论”体现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三个要点里,有两个都是以遏制防范中国等所谓的“大陆霸权”国家扩张为政策诉求。^[2]

日本主流社会在精神志趣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大陆的排斥与疑虑渊源甚深。早自明治维新以来,中国便被当时急欲进入“文明国家”行列的日本学者塑造成为一个反面的、庞大的、腐朽的可能还不时对日本构成威胁的国家。在林子平、吉田松阴、佐藤信渊等人的反复鼓吹下,日本社会延续千年之久的中华文化归属感开始被“断然”放弃,而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成为了日本着力学习模仿的典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被理解为一个在地理形态甚至文化构成与日本存在重大差异的“陆国”或“山国”,日本唯有在地理形态和文明类型上排斥东亚而趋向西洋,方能成为“大富国”和“大刚国”,进而与西洋的英吉利岛“并驾

[1]James Manicom, “Japan’s Ocean Policy: Still the Reactive State?” *Pacific Affairs*, Vol.83, No.2, 2010, p.307.

[2]廉德瑰:《略论日本“海洋派”的对外战略思想》,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1期,第12页。

齐驱”，这实为日本“脱亚入欧论”的地缘政治翻版。^[1]

随着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日本政学界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像虽经“由排斥到敌视再到蔑视”的变化调整，但总的来说，对中国的排斥和防范心理一直是一条长期潜伏在日本决策者和主流社会思想深处的精神主线。即使是在日本大陆扩张野心完全破灭之后，日本主流社会对于中国的排斥和防范心理依然不减：日本“海洋国家论”先驱高坂正尧在上世纪60年代就警告日本民众防范中国崛起后“掀起波澜”、对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造成威胁”的可能性。^[2]甚至在上世纪70、80年代中日关系友好发展之时，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中曾根康弘便驳斥了一些日本人对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怀有好感的观点，认为这是旧时代“大陆主义”热情的残余，是对亚洲怀有“乡愁”式的大亚细亚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没有深刻认识日本历史，更没有冷静计算日本的国家利益得失。^[3]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格局和地区形势的急剧变化，在“海洋国家论”风行日本的同时，中国很快便被塑造成为一个以“陆权大国”为属性、对日本等“海洋国家”构成直接威胁的地缘政治对立面，成为了所谓的“大陆亚洲”的代表。^[4]在这种论断的引导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增长，开始被多数日本政治—知识精英视为一种地缘政治挑战而非是促进中日友好的历史机遇。很多日本人用充满疑虑的目光看到，“随着在20世纪后半叶及21世纪前期的快速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国家之一，麦金德的‘历史枢纽’现已移至远东”。^[5]

[1] 藍弘岳：《十九世紀日本的亞洲論述與海国的想像》，载《2011年度財団法人交流協會フェローシップ事業 成果報告書》，2012年，第2頁。

[2] 廉德瑰：《略论日本“海洋派”的对外战略思想》，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1期，第14頁。

[3] 初晓波：《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第95頁。

[4] 白石隆：《海の帝国——アゾアをどう考えるか》，中央公論社，2000，第178-198頁。

[5] Naoto Aizawa, and Christian W. Spang, “The Pivot Moves Eastward: Mackinder and the Okinawa Problem,” *The Tsukuba Multilingual Forum*, Vol.4, No.1, 2011, p.21.

在这种基本的“敌-友”判断前提下,很多日本当代政治-知识精英开始极力鼓吹应将对付以中国为主的“大陆国家”威胁放在日本对外战略的优先位置。

在他们的筹划当中,由于美国作为“海洋国家”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日本在谋求建立与“英美特殊关系”相类似的、跨太平洋“对等的日美军事同盟”的同时,必须确保那些具有无可争辩的海洋国家属性和自由主义政体并且地缘战略意义突出、又处于关键贸易水道上的国家或地区成为对日“优先友好国家”,同日本一起共同防范“大陆国家”的兴起。在这些日本政客或学者看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太平洋国家,位于巴士海峡两翼的台湾和菲律宾,连同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均是日本必须拉拢、用以构建围堵防范中国包围圈的首选目标。在此基础上,部分日本学者还提出必须灵活运用均势原则和“远交近攻”策略,巧妙地利用各种利害关系尽量离间中俄两国,推动中俄两国产生战略对立和对抗,以防止在东亚出现中俄两大国凝聚成铁板一块的局面,因为中俄结盟是“日本的噩梦”。与此同时,日本认为:如同东欧是西欧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一样,朝鲜半岛和越南是日本与中俄等大陆霸权之间的“缓冲半岛”,日本必须联合美国防止中俄在这个缓冲地带拥有军港、航空基地和导弹基地,从而遏止“大陆国家”向海洋的扩张倾向。^[1]

作为一种地缘战略的“海洋国家论”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还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一个世纪之前所阐发的信条(即大陆国家是专制野蛮的代言人,海洋国家是民主与自由的代表)并无二致,当代很多日本地缘政治学者都相信:海洋国家因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属性(即缺乏资源,被迫利用海洋对外发展,依靠通商贸易等手段建立海运国家),因此更容易建立起自由民主政权。不仅如此,在一些日本学者的笔下,大陆文明甚至被认为是仅仅代表了人类古代文明,而海洋国家崛起则直接催生了近现

[1] 松村劭:《海洋国家・日本の军事戦略戦史に照らせば防衛政策の課題は自ずで見えてくる》,载《Voice》第4号,2006,第96页。

代文明的出现,甚至近现代人类文明本身就是海洋文明,仿佛大陆文明是属于过去的历史现象,而海洋文明才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未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包括“海权-陆权”、“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等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当中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充满对抗性和等级化色彩的二分法,在时隔百年之后又通过“海洋国家论”在当前日本社会当中开始广泛流行,这无疑是对日本社会历史认知和道德水准的又一辛辣的嘲讽。

日本部分政治-知识精英在笃信“海洋国家论”基础上所筹划的对华攻势,对当前日本对外战略形成强大影响。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日本构建对华包围圈、在外交上破坏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的趋势愈发明显。早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日本就曾提出所谓的“自由繁荣之弧”战略,以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试图在地缘政治上构建一条主要针对中国、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从亚洲的朝鲜半岛到印度、一直到中亚、西亚的环形包围圈。连日本学者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从地图上看,“不能否认该战略使人产生包围中俄的印象”。2013年1月安倍提出的所谓新的“外交五原则”,实际上仍是“自由繁荣之弧”战略的翻版,不过更强调以海洋国家定位,以日美同盟为后盾,拉拢西太平洋甚至印度洋沿岸国家共同对付中国。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围堵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对中国谋求睦邻友好的对外战略构成严重威胁。有学者认为,2008年以来中国与周边某些国家外交关系出现曲折,其背后都有日本之“功劳”,日本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在亚太遏制防范中国的外交“打手”。^[1]

四、后冷战时期日本地缘政治的特色、后果与评价

关于日本是否拥有足以确保日本应对各种安全挑战实现国家抱负的大战略问题,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塞缪尔斯(Richard J. Samuels)指出,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外战略始终具有明确的延续性:日本先

[1]段廷志:《日本结盟战略与实践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

是通过 1902 年与英国结盟,成为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权势力量;1940 年日本通过与德意签署三国轴心条约,力图达到称霸远东的梦想;战后又与美国签订共同安全条约,从而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从这一点看,日本的所有这些结盟行为都体现出一种大战略,即务实地通过权宜之计将日本与当时的压倒性强权结盟:“日本这个仅有中等规模领土、资源贫乏、与周边邻国关系糟糕的岛屿国家,需要外部的朋友方能实现其生存和繁荣。”^[1]

自二战战败至冷战结束的近 50 年时间里,主导日本对外战略的实际上就是以“吉田主义”(Yoshida Doctrine)为代表的结盟原则,即在日美安保协议上采取非军事化、防御性与低成本的安全政策。^[2]吉田主义对日本国家身份的定位极其清晰实用,其目标就是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大超级强国全球对峙背景下,利用美苏对立谋求日本的独立和安全,在通过加入美国阵营以取得安全保障的同时,尽量减少军备负担,将有限的资金投入恢复和重建经济上,从而做到安全与繁荣的一举两得。^[3]但随着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和美国力量的相对削弱,日本那种追随美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发展路线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在此情况下,日本战后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逐步复苏,“(日本)越来越不甘心只做偏安于东洋一隅的经济大国和政治、军事‘侏儒’,很自然地产生了对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政治地位的追求,要重新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政治大国’的角色”。^[4]在中曾根康弘等日本政治人物的反复鼓吹下,主张日本在全球战略事务中发

[1]Richard Halloran, “Book Review: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Parameters*, Vol.38, No.3, 2008, p.154.

[2]Yuichi Hosoya, “The Rise and Fall of Japan’s Grand Strategy: The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nd the Future Asian Order,”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1, 2011, p14.

[3]富森睿儿:《战后日本保守党史》,吴晓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4]中曾根康弘:《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李寒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挥更为积极作用的观点在日本国内很快占据了上风。

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使得美国政府不断要求日本为所谓的“国际合作”做出更多的“贡献”,敦促日本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而日本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支票外交”更使得日本政府在其西方盟友和国内民众面前“颜面扫地”。受上述事态的刺激,日本国内主流社会愈发质疑日本长期维持的、以吉田主义为代表、通过与美国结盟的方式实现“低价搭车”(cheap ride)的对外政策原则。^[1]在这场针对日本对外战略大辩论中,较那些重视商业利益和强调“反军国主义文化”的构建主义主张,日本国内那些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政治保守势力显然占据了上风,后者以冷战后东亚国际形势和权势均衡格局出现重大调整为理由,主张日本应当在安全领域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在世界事务当中承担更多的、包括军事责任在内的国际义务。^[2]

与之相对应,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和安全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早在1991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便声称,日本对外政策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今天的日本正处于一种可以实际影响所有有关建立新国际秩序的事务的位置”。^[3]1995年日本《国防计划纲要》要求在“国防需要”之外扩展日本军事能力,强调参与塑造那些“对日本和平和稳定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的军事形势。2013年12月日本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当中更是指出,日本作为国际社会一个“主要的全球参与者,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4]从上述政策中可以看出,在冷战结束后至今20余年的时间里,日本对外政策早已大幅改变了冷战时期那种在国家安全问题

[1]Yuichi Hosoya, “The Rise and Fall of Japan’s Grand Strategy: The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nd the Future Asian Order,”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1, 2011, p14.

[2]Bhubhindar Singh, “Japan’s Security Policy: From a Peace State to an International State,” *The Pacific Review*, p.304.

[3]<http://www.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1991/1991-contents.htm>

[4]http://japan.kantei.go.jp/96_abe/documents/2013/_icsFiles/afieldfile/2013/12/18/NSS.pdf.

上完全依赖美国、与地区和国际安全环境脱钩的做法,日本已经采取了一种新的、范围显然大幅拓宽的国家安全观和国防概念,有意在后冷战时期在世界性的战略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彰显其“大国地位”。现在,日本已经从一个“和平国家”向所谓的“国际国家”转变,日本开始变得“更为积极和更为自信”。^[1]而这种转变,目前已经不仅被日本的政治-知识精英所普遍接受,甚至在日本社会中这种有关安全问题的话语也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共识。^[2]

后冷战时期,日本地缘政治研究的兴起正是源自于日本社会在集体心态上的重大变化。随着美苏直接军事冲突风险的消失、传统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东北亚安全形势的持续振荡,加之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日益严峻,日本国内对于日本国家未来发展的认识一度出现了大混乱。一种被称为“地缘政治目眩”的不确定感广泛波及到日本的政治实践、大众传媒甚至通俗文化等各个领域,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对于“我们-他者”、“盟友-敌人”的基本判断。^[3]作为因应冷战后日本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的产物,地缘政治开始被日本很多政治精英用以描述日本及其所处世界、消弭这种不确定感,进而重塑日本国家和社会认同的现成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当前日本地缘政治研究当中,出现了部分学者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反思和批判战前日本“地缘政治学”的相关表述,但总的来说,以“海洋国家论”为主要代表的当代日本地缘政治研究,在精神风格上依然没有超越传统的、以权势争夺为主要风格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不仅如此,很多日本人现在都确认,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紧密关注

[1]Rikki Kersten,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Formation: Assessing the Koizumi Revolu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5, No.1, 2011, p.5.

[2]Bhubhinder Singh, “Japan’s Security Policy: From a Peace State to an International State,” *The Pacific Review*, Vol.21, No.3, 2008, p.303.

[3]S., J. Kang, “Imaginative Geography of the Nation and De-nationalized Narratives”, in Y. Komori, and T. Takahashi, eds., *Over the National History*,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8, pp.141-156.

的是领土、区位、资源和权势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在当今条件下它并未过时。在此情况下,有学者评论称,地缘政治研究在当代日本的复活和“海洋国家论”的流行,透露出来的是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胜王败寇”式的消极总结,对“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架构难以摆脱的心理依赖和神学式的皈依,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莫名的恐惧与无端的仇视以及对日本生存之道的“战略贫困”。^[1]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赖不断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日趋深入的今天,日本地缘政治研究者所坚持的“海权-陆权”两分法及蕴含的浓厚的意识形态说教,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基本无益于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与地区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这一点目前已经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的充分警惕。

[收稿日期:2014-05-25]

学术交流

6月24日,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与缅甸联邦议员访华团举行座谈,双方就缅甸国内政治改革前景、中缅关系走向等问题进行了友好坦诚交流。座谈会由研究中心主任王霄巍主持,国研所、现代院以及云南友联会等单位的学者应邀与会。

7月7日,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与菲律宾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访华团进行学术研讨,双方就中菲关系、南海问题等共同关心的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看法。座谈会由研究中心主任王霄巍主持,研究中心部分学者、特约研究员及有关研究机构专家与会交流。

[1]关希:《排他性的“海权论”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海洋国家”战略》,载《日本学刊》2006年第4期,第11页。

朝韩关系与六方会谈

时永明

[内容提要] 朝鲜半岛陷入对抗僵局,美国对朝采取了遏制待变的策略。对抗局面对朝韩的安全都不利。韩国推进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由于双方的“话不投机”而受阻。朝韩关系再陷困局,并且处于无协定、无对话、无谈判的状况。这种对抗局面的持续,致使六方会谈难以重启,核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半岛正在积累安全风险。要打破这种局面,韩国需要认清自己所处的结构性局限,推动朝韩关系重返以往双边协定所确定的和解轨道,并推动六方会谈的重启。

[关键词]朝韩关系 半岛统一 互信措施 六方会谈

[作者简介]时永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4)04-0061-14

朝鲜半岛目前陷入对抗僵局,美国关注地区战略布局,对朝鲜实行在强化遏制条件下的搁置战略,期待朝鲜发生自变。这使六方会谈难以重启。朝韩和解对解决半岛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但韩国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中所提措施与朝鲜的期望是南辕北辙。双方自年初探讨和解后,因话不投机而再次陷入僵局。僵局导致朝韩双方面临持久的安全困境。韩国无论如何增加对朝威慑力,终将不得不面对核能力日益增长的朝鲜。而朝鲜尽管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却也无法摆脱国际制裁所带来的困境。所以,通过寻求和解来最终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半岛问

题符合双方的利益需要。但和解的路径,不应是另起炉灶,而应是努力实现对已有的双边协定和六方会谈的回归。

一、奥巴马的对朝政策使朝韩关系陷入困境

2009年奥巴马上台时,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因朝韩关系急速恶化而出现功亏一篑的局面。于是奥巴马政府改变了布什政府急于求成的政策,对朝鲜实行“战略忍耐”。试图通过积极构筑美日韩合作机制,加强对朝鲜的政治压力、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迫使朝鲜发生改变。2011年7月23日,美日韩外长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谈,就重开六方会谈设置前提条件达成一致意见。此后,美朝在纽约举行会谈。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博斯沃思向朝鲜第一副外相金桂冠提出了5项条件。这5项条件是:(1)立即停止铀浓缩活动;(2)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对宁边核设施的检查;(3)遵守2005年的六方会谈共同声明;(4)停止发射弹道导弹;(5)遵守朝鲜战争停战协定。^[1]尽管金桂冠当时拒绝了美方立即停止铀浓缩活动的要求,并公开表达了将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的立场,坚称“将用于电力生产这样的和平目的”,但这并没有妨碍此后美朝继续高级别会谈。

金正恩继位后,双方继续会谈进程。2012年2月,美国国务院朝鲜问题特使戴维斯与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并达成重要共识。共识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双方对对方的关切做出承诺。朝鲜同意暂停远程导弹试射、核试验,以及暂停在宁边的包括铀浓缩在内的核项目,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朝鲜,监督和检查朝鲜暂停铀浓缩活动,以及位于宁边的5兆瓦核反应堆及相关设施停运的情况。美国则表明不对朝鲜抱有敌意,确认对朝制裁不以民生为目标,同意推进向朝提供24万吨营养援助一揽子计划。第二,双方同时采取步骤来建立互信,改善双边关系。双方再次确认了两个重要文件。一是确认在和平协定达成之前,1953年停战协定仍是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基

[1]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2011-08-05。

石。二是继续履行 2005 年 9 月 19 日联合声明。第三,双方约定六方会谈重开后,将优先讨论解除对朝制裁和提供轻水反应堆问题。^[1]朝美此次会谈成果,无疑为六方会谈的重开和半岛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此后不久,令人遗憾的是朝鲜进行了卫星发射,朝韩关系又陷入紧张状态,朝美协定最终被搁置一旁。这次失败使美国对与朝鲜建立互信关系完全失去信心。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略关注重点转向大国博弈和霸权确保,美国加快全球战略调整,加紧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对朝政策从忍耐转向加强对朝的遏制。美国对朝鲜无核化的目标让位于借助朝鲜核问题来推进美日韩三国军事协作机制的建立。

2012 年底,朝鲜再次发射卫星,美国极力推动安理会增加对朝制裁,朝美再次出现对抗轮番升级的情形。2013 年 2 月 12 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这进一步促使美国强化对朝遏制政策,美国甚至于 3 月美韩联合军演时将两架可携带核武器的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派往韩国。半岛一度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高强度的对峙使朝鲜半岛局势陷入难解的僵局。对于美国来说,打破僵局的唯一途径是迫使朝鲜改弦更张,主动放弃拥核政策。但是,美国政策出现了悖论,因为对抗只能使朝鲜发展核武的政策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今年 4 月以来美韩不断传出的对朝鲜可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猜测,正是这种对抗格局所蕴含的危险的表现。所以,从本质上看,美国进行的是历史性的的赌博。它赌的是在长期的政治军事高压和经济制裁下,朝鲜拥核发展的战略难以持续,朝鲜也必然因为经济困难而发生内部变化。

但是,半岛的紧张局势首先影响到朝韩双方的安全环境和双边关系的发展。2013 年 3 月,朝鲜为对抗美韩高强度联合军演,宣布废除《朝鲜停战协定》和一切有关朝韩互不侵犯的协定,不承认《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这几乎使冷战后朝韩和解的努力土崩瓦解,双边关系陷入停战以来最糟糕的状态。这种局面给双方都带来巨大的挑战。长期对峙

[1]Reuters, “North Korea-U.S. deal revives hopes of nuclear disarmament talks,” 2012-03-02.

下去双方都要冒难以估量的安全风险。朝韩需要重建互信来打破这种安全风险不断上升的局面。

二、朝韩和解遭遇困境

2013年的高强度对抗使朝韩双方都意识到对抗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增加安全风险。所以,2014年初,朝韩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新年时双方相互示好,而后双方恢复了高层会谈,实现了离散家属的再次团聚。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双方就又陷入对立情绪之中。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在相互认知,建立互信的路径,乃至和解的目标上都出现了话不投机的现象。

(一)朝韩在建立互信上出现路径错位

冷战后,朝韩关系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状态,这严重影响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因此对双方来说,建立互信的必要措施之一就是减少军事对抗。但是,目前情况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朝鲜方面看,今年初提出的和解建议目标依然明确地指向解决自身面临的现实安全问题。1月16日,朝鲜国防委员会发表致韩国当局的“重大提议”:第一,为营造改善南北关系的气氛,从1月30日起以春节为契机,提议采取实际措施全面停止相互刺激、诽谤中伤的一切行动。第二,双方停止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要求韩国停止将在2月底举行的“关键决心”和“秃鹫”两个韩美联合军演。提议在西海五岛热点地区的陆海空方面,全面停止刺激另一方的一切行为。第三,提议互相采取现实性措施预防在半岛发生的核灾难。要求韩国不要把美国的核打击手段引进韩国及其周边地区。朝鲜认为,如果落实了这些重大安全措施,离散家属会面等南北关系中的一切大小问题都会随之得到解决。^[1]显然,朝鲜认为朝韩之间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全关切。这个观点在2013年元旦金正恩首次对外发表新年讲话时就已明确表达过,金正恩在讲话中称,“结束国家分裂、实现统一的一个重要

[1]“NDC of DPRK Advances Crucial Proposals to S. Korean Authorities,”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of Dprk, 2014-01-16.

因素是消除南北之间的对抗”，“过去朝韩间的关系显示，同胞间的对抗只会导致战争”。^[1]

但是，韩国方面最初认为“朝方的提议其实是虚伪的‘和平攻势’”，因而事实上拒绝了朝鲜的提议。^[2]韩国这种反应与其对朝鲜的基本政策取向有关。韩国新总统朴槿惠上台时提出“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对朝政策。她表示，“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核心是以强力威慑力为基础让朝鲜为其错误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但如果朝鲜想要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那我也一定会明确提供机会和支援”。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对挑衅的妥协和补偿的恶性循环”。^[3]由此可见，韩国的政策是以首先确保对朝鲜具有“强力威慑力”为基础的。这在安全上自然形成零和效应。韩国威慑力的增强，将会被朝鲜视为安全威胁，而朝鲜要求韩国停止韩美联合军演，又可能会被韩国认为是要削弱这种威慑力。与当年中美朝韩四方会谈时，朝鲜要求美国从韩国撤军，被美国解读为朝鲜意图为武力统一做准备，是一个道理。韩国新政府的思路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诸如保障离散家属会面等可以做得到的具体事情，来逐步积累双方之间的信任。朴槿惠总统甚至提议将在非军事区(DMZ)建立世界和平公园作为建立信任的出发点^[3]。

显然，朝韩之间在如何建立信任的问题上出现路径分歧。朝鲜主张首先通过减少军事对抗，特别是减少美韩联合军演来建立互信。韩国则主张要先通过交流来逐步积累信任。韩国的政策是出于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对朝鲜的不信任。而朝鲜则认为韩国是避重就轻，另有图谋。不过这种路径分歧虽然增加了双方建立互信的困难，但尚不构成双方改善关系的绝对障碍。而真正导致朝韩在和解道路上停滞不前的是双方在和解的最终目标上出现认知问题。

(二)在半岛统一问题上的认知差异

[1]路透社首尔：“金正恩意外发表新年讲话 呼吁结束朝韩对抗”，2013-01-02。

[2]韩联社首尔：“韩国政府：朝鲜应立刻停止对韩诽谤和中伤”，2014-01-20。

[3]韩国总统朴槿惠：“实现新韩朝关系的旅程”，载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http://cn.joins.com>，2013-12-31。

多年来,朝韩关系中存在的唯一共识就是半岛的最终出路在于实现统一。统一问题一直是朝韩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到两国关系的基本定位和发展方向,如何处理统一问题会从根本上影响朝韩关系的发展。朝鲜半岛因为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在日本战败后出现了权力真空。由于在抗日的过程中朝鲜民族出现了两股不同的代表力量,因此在战后国家重建的过程中谁是民族的真正代表,谁具有掌管国家权力的正统性成了朝鲜半岛内部民族分裂的内在根源。这也正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即便在今日和平统一是双边共识的情况下,统一问题仍然既可以成为促使双方和解的动力,也可能成为双方对抗的根源。正因为如此,朝韩之间的每一轮和解都必然首先谈及统一问题。同样,今年2月双方的高层会谈,“一致同意改善关系,实现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和自主统一”,^[1]再次确认了“自主统一”的共识。

韩国新政府也是从一开始就将此轮和解与统一问题联系到一起。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今年的新年记者会上表示,“为了实现韩国的新一轮腾飞,韩国需摆脱战争和核武器的阴霾,开启朝鲜半岛统一时代”。^[2]不仅如此,韩国还一再在国际场合宣传半岛统一的好处,希望国际社会支持半岛的统一。今年2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宣传半岛统一的好处有三,一是韩国的“红利”,二是朝鲜人民的解放,三是周边邻国的“头奖”。^[3]韩国媒体今年初的大量报道也显示出韩国已经开始着眼于统一后的半岛蓝图。但是,韩国在南北统一问题上,对非共识性的单方面主张的宣传在改善朝韩关系上取得的效果却是适得其反。3月28日,朴槿惠总统在原东德的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发表题为“韩半岛和平统一构想”的主旨演讲,向朝鲜提出了三大提议,即优先解决韩朝居民的人道主义问题,为韩朝共同繁荣构建民生基础设施,恢复韩朝居民之

[1]“Inter-Korean High-level Contact Held,”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of Dprk, 2014-02-14.

[2]“朴槿惠发表新年计划 强调为韩朝统一做准备”,中新网,2014-01-06。

[3]“Park calls Korean unification ‘jackpot’ for neighbors too,”韩联社,2014-01-22。

间的认同感。她说,朝韩应消除军事对抗、不信任、社会文化不融合等障碍。^[1]然而,由于朴槿惠总统在讲话中显露出要依照德国模式实现半岛统一的意思,可能会在朝韩关系上产生消极效果。一位出生于原东德地区,对德国统一进程有着亲身体验的德国学者认为该讲话“向朝鲜传递的绝不是合作的信息”,因为它“缺乏对历史和朝鲜人民的理解”,会使朝鲜人民感到在未来统一的国度里没有应有的地位。^[2]

果不其然,4月23日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表“致朴槿惠的公开质询书”,质询朴槿惠到底要如何实现“统一”,指出依靠外来势力一方吞并另一方的“体制对抗”意味着战争。^[3]

朝鲜此次采取质询的方式,而非直接批判指责,一是因为尚不能十分准确地掌握朴槿惠关于统一问题的真实想法,二是出于为双方探讨统一问题留有余地。对朝鲜来说,朴槿惠应该与李明博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又不清楚朴的对北政策与李究竟有何不同。而韩方在阐述统一问题时,在许多关键点上确实有意无意地加以模糊。这一方面反映了认知上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反映了其在政策选择上面临的困境。

(三) 朝鲜明确拥核战略增加了朝韩和解的难度

朝韩之间最难解的问题是核问题。核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主要是美朝之间的问题,但自李明博上台后,它也成了朝韩之间的主要问题。因为李明博将解决核问题当做了实现南北和解的条件,使朝鲜认为李明博敌视朝鲜。朝鲜的第二次核试验主要针对的是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如今,对朴槿惠政府来说,在核问题上面临比以往历届政府都更严峻的挑战。就在朴槿惠上任之前,朝鲜不仅明确将拥有核武器作为国家战略,而且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美朝关系陷入僵局,使解决核问题变得更加遥遥无期。美

[1]《朴槿惠在德累斯顿工大发表演讲 提出对朝三大提议》,韩联社德累斯顿,2014-03-28。

[2]Ruediger Frank,“Fire the Speech Writers: An East German’s Perspective on President Park’s Dresden Speech,”03 April 2014.<http://38north.org/>.

[3]“Prospect for North-South Relations Depends on Park Geun Hye: CPRK Open Questionnaire,”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of Dprk,2014-04-23.

朝的对抗,使韩国处于朝鲜有可能进一步进行核试验的忧虑之中。

事实上,美朝的核僵持给朴槿惠政府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使其对朝政策陷入两难境地。韩国政策选择的两难困境在于,究竟是通过和解来解决核问题,还是先解决了核问题才能实现和解。在美国希望通过高压政策迫使朝鲜改变的政策下,作为美国盟友的韩国实行对朝制裁是保障美政策取得成功的重要环节。这意味着,韩国需要对朝鲜保持强硬立场。这自然会妨碍朝韩和解与互信的建立。而如果韩国实行对朝和解政策,那就不可能不在经济上对朝鲜给予帮助,这自然会削弱美国的制裁效果,从而遭致美国的反对。今年2月20日美国国会研究部发布的《韩美关系报告》中说,随着韩朝关系取得进展,韩国政府若扩大开城工业园区和将其实现国际化的话,要求加强对朝制裁的美国国会可能会与韩国政府就此产生矛盾。^[1]可是,如果韩国将对朝援助与朝鲜无核化联系在一起,就可能在与朝发展关系时遇到障碍。此外,在美朝对立的条件下,单方面的朝韩和解难以推动核问题的解决。对韩国来说,朝韩和解的意义又将因此而大打折扣。

朴槿惠的对朝政策,是希望在金大中和卢武铉通过和解来寻找核问题的答案与李明博希望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二者之间摸索出一条中间道路。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看到的就是韩国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朝鲜发生改变。但这种希望本身意味着朝韩有可能陷入长期的对峙中。在过去的25年中,朝韩关系是在寻求和解的进程中对峙,而未来在僵局中的对峙则可能出现危险系数不断增加的情况。

三、重建朝韩关系需回归以往的协定

对于韩国来说,要避免出现朝韩关系陷入长期危险对峙的状况,或是谋求尽早摆脱半岛对立局面对其追求中等大国国际地位的束缚,需要

[1]《美报告:韩美或因扩大开城工业园区而产生矛盾》,韩联社华盛顿,2014-02-20。

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和目标有更清醒的理性认知。要解决朝韩之间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恐怕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温故知新,重回以往的协定。

(一) 韩国需要摆脱结构性矛盾的制约

韩国新政府对北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是希望摆脱冷战后朝韩和解进程不断出现反复的局面,形成双边关系的稳定进展。但是,对于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局面的出现,却未能有足够的分析和总结。

其实,朝韩关系不能稳定进展,与韩国国内的二元化政治结构和半岛问题的朝美韩三角结构这两种因素的叠加效应有着密切的关系。

韩国自建国后,国内就分成了激进势力和保守势力两大阵营(也称“左翼”和“右翼”),但韩国长期处于军人统治之下。1980年韩国发生民主运动,1987年才基本实现民主化。1988年,韩国提出北方政策,其大的历史背景,一是国内的民主化发展,二是国际上冷战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尼克松主义的冲击,迫使韩国在安全上提升自主性。美苏关系的缓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变化,为韩国寻求通过与中苏两大国发展关系,来促进南北和解、半岛统一创造了条件。上世纪90年代初朝韩关系正是在这种内外因素的推动下,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但是,民主化的成功,并没有改变韩国社会的二元化结构。民主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左翼势力成了推动朝韩和解的主要力量。上世纪90年代末,当年的民主运动领袖金大中当选韩国总统,开始对朝鲜实行阳光政策。随后卢武铉继承金大中的基本精神,对朝实行“和平繁荣政策”。然而,保守势力代表李明博上台后,对金卢二人的对朝政策给予了彻底的否定。这种否定的根据与其说是基于朝鲜发展核武的事实,不如说是基于党派利益。如果西方民主制度的轮流执政意味着新上台的党派可以随意废弃前任签署的国际文件,那么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看,美国人常说的民主制度是国际秩序稳定的保障,可能就是一句谎言。不幸的是,在朝鲜半岛,我们先是看到小布什政府废除了克林顿政府与朝鲜签署的《核框架协定》,而后是李明博政府将金、卢两位前总统与朝鲜领导人签署的《宣言》弃之一边。这两项重大变故,都曾导致朝鲜半岛的紧张。可

见，韩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决定了韩国难以有持久稳定的对朝和解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要朝韩关系稳定发展，任务相当艰巨。

其实李明博政府指责金、卢二人的怀柔政策未能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并因此认为二人政策失败，这既忽视了六方会谈达成《9·19 共同声明》的事实，也不理解朝鲜半岛存在的朝美韩三角结构和韩国在这种结构中的地位。

冷战后，美国唯一能够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借口只有核问题。在核问题上，美国是主宰，因为它决定着判断朝鲜是否无核化的标准。所以，朝鲜在核问题上的主要谈判对象是美国，而不是韩国。朝韩之间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已经签署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但美国要借核问题介入并主导半岛局势走向，所以美朝就核问题进行了双边谈判。在美国废除 1994 年的《核框架协议》后，朝核问题采取六方会谈的形式，其意在于避免朝美双边谈判的不可靠性。尽管是多边会谈，但主角依然是美朝，其他国家主要为增进互信做出相应努力。六方会谈达成《9·19 共同声明》之后，朝鲜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其直接原因在于美国违背协议的和解精神，对朝鲜展开了金融制裁。所以将朝鲜第一次核试归罪于卢武铉政府的政策失败有失偏颇。

对卢武铉的指责，说明李明博政府对韩国所处的地位和所能够发挥的作用缺乏认真的评估，所以他采取的政策往往过于主观。当时在美朝恢复对话，六方会谈开始取得新进展的情况下，李明博政府却要在核问题上显示自己的力量，不仅将核问题作为双方发展关系的前提，而且在朝韩双边问题，甚至朝鲜内政问题上都对朝鲜进行强硬施压，甚至中断朝韩和解进程，这不仅越了美国的位，搅了美国的局，而且犯了朝韩关系中的大忌，损害了解决核问题所需的互信建设。

应该看到，朝美韩三方在核问题上存在着一个矛盾循环激化的结构。韩国在安全上依靠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但朝鲜视美国为直接威胁，朝鲜针对美国所采取的反制措施又成了对韩国的威胁。韩国在自身安全上可以和美国合作采取强硬态度，但是在核问题上甚至在朝鲜的内政问题上采取积极施压的政策，除了会激化矛盾外，并不会收到其他效果。韩国

在处理这个三角关系时通常有两种政策选择逻辑。一种逻辑认为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有对自身安全需要的考量,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互信,解决安全问题,达到化干戈为玉帛的目的。另一种逻辑则首先给朝鲜定个性,将一切问题归因于朝鲜,要以高压手段迫使朝鲜先弃核,甚至寄希望于朝鲜政权的改变。依照前一种逻辑,韩国对朝政策应以推动和解,增进互信为目标。依照后一种逻辑,韩国则应以配合美国对朝施压为主。这里我们且先不对两种逻辑进行道德分析。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在现实中,在朝核问题上,第一种逻辑往往能取得进展,而第二种逻辑往往导致僵局。事实上,如果没有金、卢对北怀柔政策,六方会谈要达成《9·19 共同声明》是很困难的。而六方会谈最后的停滞,虽然直接原因是美朝在核查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其背后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朝韩关系的恶化使朝鲜在安全上对与美韩建立互信已完全丧失信心。所以,在美国主导核问题,朝鲜处于关键地位的情况下,在朝美韩三角结构中,韩国自身所处的位置并不具有优势。韩国要想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取得好的效果,需要理性的思考,并形成独立而稳定的政策。其中要运用的是智慧而非力量。

(二) 回归以往协定才能真正积累信任

韩国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处理朝韩已签的双边协定和未来“积累信任”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李明博政府事实上搁置了金、卢两位总统与朝鲜签署的声明,朝鲜又宣布废除双边协议,所以朝韩之间目前处于没有有效的双边协议的情况。朴槿惠政府的对北政策几乎没有涉及到任何双方文件。如果“积累信任”进程从零做起,必然举步维艰。

韩国要想克服朝美韩三角关系中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在处理朝韩关系时,应首先在解决双边之间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形成国内稳定的共识,保证自身在这些问题上政策的稳定性。如此,才有利于朝韩之间积累信任。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就有必要珍惜过去双方之间已经达成的各项协议。因为,如果抛弃过去的协定,就意味着违背现代商业社会最基本的守信原则,这不仅会增加相互的不信任,而且即便签署新的协定也会成为一纸空文。最重要的是,过去的协定几乎包含了朝韩关系中的所有基

本的结构性问题,反映了双方相互认知的历史进程。只有通过重新评估这些协定,并加以继承和发展,才能找到朝韩未来和解的路径。

回顾朝韩和解进程,其中有两个基础性的问题是难以回避的。一是统一问题,二是西海问题。

在统一问题上,1972年朝韩之间就达成了“统一三原则”。其中“自主”、“和平”两大原则无可争议。但如何体现“超越思想、信念和制度的差别”这项类似“一国两制”的原则,一直是双方在统一问题上的矛盾焦点。直到2000年金大中访朝时,双方签署《6·15共同宣言》,认为南方的“邦联制方案和北方提出的初级阶段联邦制方案互有共同性,双方决定今后将朝着这一方向推进统一的进程”。^[1]2007年卢武铉访朝,双方签署的《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进一步将“超越思想和制度的差异”发展为处理双边关系的准则。^[2]如今韩国政府的统一政策,给朝鲜的印象是要实行德国式的“吸收统一”。而事实上,韩国与德国的差距在于,西德自1969年勃兰特提出“新东方政策”后,始终坚持和解政策,坚持“同胞”应高于“体制”与“理念”的思想。所以,在统一问题上韩国政府有必要继承以往达成的共识,形成稳定的和解统一政策。只有这样双边才可能出现“情感接近”和“信任积累”的局面。

除了在双边关系的基本定位上要形成稳定政策之外,一些容易导致双方发生冲突的具体问题也应设法解决。朝韩关系与东西德关系的不同之处在于朝韩之间曾发生过你死我活的战争,并且至今有些问题仍未解决。这些问题严重地妨碍着双方互信的发展。停战以后,朝韩之间发生冲突最多的地方是停战协定没有涉及的西海问题。由于停战协定并没有划分朝韩在西海上的界线,所以1953年8月,时任联合国军司令部总司令的美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划定了一条海上警戒线,后被称为北方界线。但朝鲜自1973年起明确表示对此不予承认。1976年,朝鲜以黄海道与京畿道陆上分界线的海上延长线为标准自行划定了一条“南方警戒线”,以12海里宽度主张在西海海域的领海管辖权。双方由此争议不断。

[1]详见:2000年6月15日《南北共同宣言》第2条。

[2]2007年10月4日《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第2条。

所以,西海问题一直是朝韩和解进程中的一个基础性课题。双方从寻求和解开始就在讨论这个问题。1992年生效的《南北基本协议书》的附属协议书中规定:“南方和北方的海上不可侵犯界线问题今后将继续协商。到确定海上不可侵犯界线为止”。但此后由于核问题,朝韩关系不断出现反复,西海问题的协商陷入停滞。1999年,朝鲜单方面提出了一条分界线,要求将停战后一直为韩国占领的西海五岛及附近海域划归己有。而这导致了当年和2002年在延坪岛附近发生两次冲突。

此后,随着朝韩关系改善,西海问题重新进入对话解决的轨道。2004年6月朝韩军方首次就防止在西海发生偶发性武装冲突达成协议。2007年,朝韩首脑签署的《10·4共同宣言》表示,“为预防在西海海域发生的突发性冲突,制定共同捕鱼海域”,并“磋商将该水域指定为和平水域的方案和对各种合作项目的军事保障措施等建立军事信赖关系的方案”。然而,当朝韩关系再次出现反复的时候,西海又再现冲突。2009年11月10日,朝韩海军在大青岛附近发生交火。2010年11月23日又发生延坪岛炮击事件。今年4月,双方再次在西海发生摩擦。

可见,西海问题严重妨碍朝韩和解。韩国如果回避对话解决问题的政策,则显然不利于推进半岛的互信建设。这必将削弱韩国在半岛三角结构中的地位,限制韩国影响力的发挥。要改变这种局面最有效和直接的方式是回归《10·4共同宣言》的和解精神,将西海问题纳入对话解决的轨道。

(三) 回归六方会谈才能实现持久和平

朝韩关系与当年东西德关系的另一点不同在于朝韩关系受制于半岛无核化问题。无核化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不是朝韩双边关系的问题。但是,二者之间有着明确的相关性。朝韩和解与解决核问题,既可以相互促进,也可以相互阻碍。朝韩和解有利于核问题的解决。而朝韩关系恶化,也会给核问题的解决带来困难,反之亦然。朝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和解,明显对解决核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1992年1月7日韩国宣布取消当年韩美联合军演,1月20日朝韩签署《半岛无核化宣言》,1月30日,朝鲜签署了核安全保障协定。当时这一段历史向我们说明了两

个问题,一是如果从解决共同安全的角度来解决朝核问题,就比较容易推进。二是朝韩双方的共同努力可以为解决核问题创造条件。此后六方会谈的起起伏伏也说明了这两个道理。

其实,纵观从上世纪80年代末几乎同步开始的朝韩和解及半岛无核化进程,我们可以看到朝韩关系的发展始终受到由核问题带来的外部因素制约。而韩国也试图突破这种制约。卢武铉时期曾提出韩国要扮演东北亚的平衡者,朴槿惠总统提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首尔进程),这都反映了韩国的这种愿望。卢武铉为自己的构想大胆推行“和平繁荣”政策,但朴槿惠显然受到了各种因素的牵制。这其中因素之一是朝韩双方不能通过和解来完全解决相互的安全问题,因为半岛的安全问题与外部因素密切相关。历史决定了朝韩要解决相互安全就必须同时解决核问题及相关的地区安全架构。而六方会谈给朝韩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平台。

卢武铉曾想借这个平台唱一出朝韩合作主导的戏。他于2007年与金正日签署了《10·4共同宣言》,不仅对如何发展朝韩双边关系进行了全面阐述,而且提出通过四方会谈“构筑恒久的和平机制”,以及“为解决朝鲜半岛和平问题,力促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2·13共同文件》顺利落实”。

事实上,六方会谈进入到后期,“解决核问题需要构筑半岛和平机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共识。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朝韩和解与合作是必要的基础。所以,对朝韩双方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朝韩只有借助六方会谈这个平台才有可能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朴槿惠总统的“半岛信任进程”如果不能通过朝韩和解来推动六方会谈的重启,朝韩要实现和平统一几乎就是一种奢望。对于韩国来说,应该从更宏观的视角来构筑自己的安全体系,而不是将国家的命运交给与某个超级大国的联盟。一个能够使自己处于中心地位的地区性安排,才能使半岛实现长治久安,并大幅度抬高韩国的国际影响力。

[收稿日期:2014-06-26]

菲律宾军队现代化计划与南海问题

阳 阳

[内容提要] 薄弱的军事实力和南海问题催生了菲律宾的军队现代化发展计划。南海问题不仅为菲律宾军队改革和军费增长提供了合法借口,而且为美军对菲军事援助提供了合理理由,成为菲律宾谋取地区优势的突破口。菲律宾利用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实现发展军事实力的战略意图,其不断推动南海问题扩大化的行为也将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下去。

[关键词] 菲律宾 军事诉求 南海 意图和动向

[作者简介] 阳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讲师、博士。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14)04-0075-12

在菲律宾历史上,第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军队诞生于 1897 年。但在其 10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殖民主义、冷战格局的限制和影响,菲律宾并未形成与其地缘特点相匹配的武装力量规模和军力结构。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撤出驻菲律宾苏比克湾和克拉克两大军事基地,菲律宾军事力量薄弱问题进一步显现,菲政府着手策划军队改革。然而,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军队现代化计划遭遇重重困难,举步维艰。为了保障军队现代化计划的优先权和合法性,菲政府开始将目光转向南海问题,并展开一系列导致南海争端升级的行动。菲政府如何通过炒作南海问题为军队现代化计划服务,又在南海问题上获得了哪些军事利益,其未来动向如何,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菲律宾落后的军事实力及其主要原因

菲律宾实行志愿兵役制,其武装力量主要包括现役军事力量和准军事力量两部分。2010年统计数据显示,菲律宾总兵力约为16.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17%。其中,现役总兵力约为12万人,准军事力量为4.6万人。现役总兵力主要分为陆军、海军及海岸警卫队和空军三个军种,兵力分别为:7.7万人、2.6万人和1.7万人。^[1]菲军的装备主要以小型化武器为主,如轻型坦克、便携火炮系统、直升机、轻型护卫舰、近岸巡逻舰等,这些装备灵活性和机动性强,但火力打击能力和远程作战能力有限。而且,菲军的装备大多是购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西班牙等国的二手装备,或是这些国家淘汰所赠予的,因此这些装备相对落后,效能低下。

根据Global Fire Power的评估,在全球106个具备潜在常规战争能力的国家及地区中,菲律宾排名第37位;在亚太地区20个“整装角力军备”的国家中,菲律宾排名第14位;在东南亚10国中,菲律宾军力则排名第4位。然而,当人口数量被纳入背景参数时,菲律宾这一排名优势不再。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菲律宾人口数量将突破1亿大关。^[2]Global Fire Power的评估显示:106个国家及地区中,人口过亿的国家共有12个,其中8个均排在全球军力榜前20名内,菲律宾未在其列;亚太地区人口过亿的国家总计7个,其中5个位列全球军力榜前20名内,菲律宾仍不在其列。而在东南亚地区,人口过亿的国家仅为印尼、菲律宾,菲律宾次于印尼、越南、泰国,军力排名第4。就军兵种实力而言,菲律宾空军

[1] 数据来源:Philippine Air Force (GlobalSecurity), Philippines Military Strength (GlobalFirePower), EC-OMB Corruption Prevention Project: Integrity Development Review of the AFP-Philippine Navy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Philippines Military Stats (NationMaster), Armed Forces Personnel Total In Philippines (TradingEconomics)。

[2] 根据菲律宾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底菲律宾人口为9873.4万,年增长率为1.89%,2014年人口将达到1.06亿,Global Fire Power 2014年度的军力评估直接采用该数据作为人口背景参数。

在 106 个国家及地区中排名第 57,在东南亚地区落后于泰国、越南、印尼和马来西亚,海军在 106 个国家及地区中排名第 19,在东南亚地区逊于印尼。

总的来看,菲律宾的常规军力在亚太地区并不居于优势地位。作为坐落于世界上最大岛群——马来群岛的国家之一,菲律宾拥有 7,000 多座岛屿,海岸线长达 3.6 万公里,而其现有的武装力量相对薄弱,尤其是海、空军装备落后,发展不足且不平衡,缺乏协同作战和远程打击能力。

菲律宾军力落后的现状缘于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因素。菲军在历史上与美国渊源颇深。16 世纪中期,菲律宾成为西班牙海外殖民地。19 世纪末,随着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菲民族解放组织“卡蒂普南”成立,成为日后菲军雏形。1896 年“卡蒂普南”成立革命军,菲律宾历史上第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军队诞生。1898 年 4 月,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在菲律宾革命军的协助下,很快打败了西班牙军队,并通过《巴黎和约》接管菲律宾。菲革命军遂发起反美独立战争,由于军事实力悬殊,菲革命军惨败并发生分化。美军通过吸纳原菲革命军人员和招募菲人充实驻军,使其在美海军服役的菲人达 1,700 多人。^[1]1934 年 3 月,美国颁布《泰丁斯—麦克杜菲法案》,规定在 10 年过渡期后允许菲律宾独立,并把陆军基地交还菲律宾,只暂时保留海军基地。1936 年 1 月,菲国民议会通过自治政府第一号法令“国防法”,规定建立菲非常备军和后备军队伍。由于菲尚处于独立前的过渡期,菲军实际上是在美军的援助和培训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军的 2 个师和 10 个预备役师编入美驻远东部队参加作战。战后菲虽然独立,但在军事上仍然受制于美军。1951 年 8 月 30 日,美菲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在菲驻军的权力,并建立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之后,菲军仍以美军编制先后参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1957 年 7 月,菲军建立独立的军事司令部,对内指挥部队参与经济建设、戒严、镇压叛乱等,对外仍追随美国的军事战略,并于 1990 年代以美国盟友的角色参加了在

[1]P.C.Morante,“Significant Chapter in Naval History - Belongs to Our Filipino Shipmates,”<http://www.wartimepress.com/>, 2013-08-18.

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两场战争。

菲律宾不仅在军事上受制于美国,在经济上也严重依赖美国,这也导致其军队长期缺乏独立的经济支持。美国通过“佩奇—阿尔德里奇法案”、《菲美贸易协定》(后修订为《劳雷尔—兰利协定》)等控制菲律宾农矿产品加工、交通运输、电力等国民经济命脉产业以及主要经济部门。尽管菲律宾独立后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长期受制于外国资本,过早开放市场,致使民族工业发展受限,加之人口增长过快,贫困问题成为历届政府无法摆脱的难题。据菲律宾人口部门统计,截至2010年,菲律宾有40%(即3,0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受到国内经济形势的制约,菲军的发展计划一直处于被搁置的状态,政府不得不招募大批企业家参与军队非直接战斗装备的建设,装备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发生菲总统在检阅部队时因军车连续抛锚,不得不下车步行完成检阅的情况。

除美国因素外,菲律宾国内动荡的政治环境、根深蒂固的腐败文化等都对军队发展形成阻力。自1946年独立以来,菲律宾已历经三个共和国,总统更迭多达12届,其中不乏通过武力上台者,国家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1990年,科拉松·阿基诺政府提出军队现代化计划,但不久后随着总统去职,这一计划也暂时搁置。该计划后来虽得以重启,但实施过程时断时续,尤其在遭遇政治危机时,军队现代化计划便沦为政策失误、罔顾民生的口实。另一方面,各个政党普遍缺乏长远的政治纲领,政客行事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加之腐败文化根植,总统在任命政府主要官员时掣肘于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而政府行政体制又缺乏透明度,为官员腐败大开方便之门。2002年5月,菲律宾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罗兰多·安达亚披露,政府各部门每年用于公共项目建设的预算由于未公开招标,50%被贪官和承包商合谋贪污侵吞了。^{[1]370}这一情形也严重影响军队现代化计划的展开,由于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军队现代化计划不得不多次中止。

[1]朱幸福:《风云诡谲的菲岛政坛:中国资深记者对菲律宾民主的观察与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33页。

二、利用南海问题推动实施菲军现代化计划

菲律宾军队现代化计划主要历经三个阶段：酝酿启动阶段、停滞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与南海问题密切相关。

1. 酝酿启动阶段。这一阶段始于 1990 年。由于美军驻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和克拉克两大基地租约到期，美、菲在基地租金上存在分歧，加之菲律宾国内民族主义力量的反对，美军于 1991 年撤离两大基地，结束了美军在菲律宾长达近百年的实体存在。美军的撤离进一步暴露了菲律宾自身军事力量的薄弱，菲政府不得不将军队发展问题提上日程。1990 年，菲总统科拉松·阿基诺促请国会支持一项 10 亿美元的十年军队现代化计划，但并未得到国会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他们认为，菲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减少贫困，而不是扩大军备。为了给军队现代化计划寻求合法借口，菲律宾政府将目光投向南海。1995 年 1 月底，菲律宾借口其一艘渔船被中国军队拘留，掀开“美济礁事件”的序幕。2 月 8 日，时任总统拉莫斯发表声明，指控中国在美济礁为渔民搭建的高脚屋是“军事设施”，并声称菲律宾“拥有主权的南沙海域遭中国入侵”，公然指责中国“违反国际法和 1992 年马尼拉东盟会议有关南中国海宣言的精神与要旨”。随后不到一个月，菲国会立即批准了 1990 年曾被驳回的军队现代化计划，将其周期延长至 15 年，预算追加到 20 亿美元，占当年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的 2.4%。为了进一步刺激民众对军队现代化计划的兴趣，菲律宾政府无视中国的解释，在“卡拉延群岛”（Kalayaan Island Group，亦即包括南沙中业岛、马欢岛等 54 个岛礁、沙洲）上增加驻军，甚至出动海军炸毁中国在部分南沙岛礁上设立的测量标志，骚扰、拘留中国渔民，将多名本国与外国记者分别用船只和直升机载运到美济礁上进行所谓“采访”。在美济礁事件上，菲律宾采取上述措施导致事件扩大化、复杂化，一个重要的目的即是通过制造“国家主权遭受侵害”的假象，迫使民众相信国家防卫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军费增长寻求合法借口。正如菲外长罗伯托·罗米洛所指出：无论如何，如果菲律宾的国家安全不出现

危险,这个问题(军队现代化)就不会受到关注。而菲军总参谋长阿图罗·恩赖尔也表示:有一种感觉,国会是因南沙群岛才批准这笔拨款,但我们并不感到问题会激化到发生公开的武装冲突。^[1]

2. 停滞阶段。军队现代化计划虽然获准通过,但却造成财政上的沉重负担,从1995年底至2010年,整个计划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尽管菲政府出售首都马尼拉地区的部分开发权以解决资金不足问题,但原定前5年共11亿美元的启动资金只到位了2亿多美元。为了渲染国防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获取后续经费,菲律宾政府于1997年炮制“黄岩岛事件”,将所谓“主权范围”从“卡拉延群岛”扩展至黄岩岛。而在此之前,菲律宾从未对黄岩岛的主权提出异议,菲驻德国大使比安弗尼多曾在其致德国无线电爱好者的信中,明确表示“黄岩岛不在菲领土主权范围以内”。^[2]在黄岩岛事件的基础上,菲律宾又于1998年再度重演“美济礁事件”。菲律宾单方面挑起南海争端显然不是随机行为,其政府意图重演历史,以转移国内矛盾,争取民众对军队现代化计划的认同和支持。1998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使菲军队现代化计划难以为继,遭遇搁浅。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展开全球反恐战略,针对菲南部存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美支持菲重启军队现代化计划。应美国的要求,菲军队现代化计划的内容被修订为通过联合“反恐”促进菲军发展,并更名为“防务改革”,实施周期延长至18年。然而,美国提供的部分经济援助并未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加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菲“防务改革”陷入僵局。就在此时,菲律宾参议院重提南海问题,通过“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议案”,将中国的南沙群岛及黄岩岛划为菲律宾所属岛屿,再次欲借激化南海局势为军费投入寻求合法借口。然而面对日益不利的经济形势,2010年,菲国会几乎停止了对“防务改革”的拨款,尽管菲总统阿基

[1]《上世纪90年代中菲美济礁事件始末》,载《现代快报》,http://kb.dsqq.cn/html/2012-05/14/content_178509.htm, 2013-12-03。

[2]Ten Questions Regarding Huangyan Island, Embass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http://ph.china-embassy.org/eng/xwfb/t941672.htm, 2012-06-15。

诺三世多次表示期望私营企业资助军队改革,但“防务改革”最终还是因资金不足而再度搁浅。

3. 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以来,菲律宾政府加紧炒作南海问题,以推动军队现代化计划二次重启并快速发展。2011年7月,菲国会议员公然登上南沙群岛的中业岛并安插国旗;2012年4月,菲抓捕中国渔民导致对峙事件;9月,菲总统阿基诺三世签署20号法令,将西菲近海由“南中国海”改称“西菲律宾海”。菲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公开化、强硬化的态度,进一步煽动了菲律宾社会的反华情绪,民间团体频繁游行示威,甚至发生焚烧中国国旗的极端行为。在这一情形下,2012年12月,菲政府抓紧时机通过10349法案,正式重启军队现代化计划,并承诺5年内投入约18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之后,菲并未停止激化南海问题的行为,于2013年1月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法庭,5月又发生公务船射杀台湾渔民事件,9月无端指责中国在黄岩岛上建设防御工事等。

2014年,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进一步升级,甚至呈现出“军事化”迹象。2月25日,菲军宣称把黄岩岛置于西部军区管辖下,并表示“当时机到来时”菲军将对中国进行军事回应,以保护本国渔民。3月14日,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拒绝拖走菲军于1999年以“船底漏水”为由坐滩在仁爱礁的破旧登陆舰,并宣称其为菲军现役军舰,作为永久政府设施放置在仁爱礁上。5月6日,菲海警拦截、非法抓扣在南沙半月礁作业的11名中国渔民,押送至菲巴拉望公主港。5月27日,菲海军在距离南沙群岛最近的巴拉望省乌卢甘湾(Ulugan Bay)庆祝海军建军116周年,宣称将在该地建立能容纳驱逐舰,甚至是巡洋舰的现代化海军基地。配合“军事化”的行动,菲国媒体加紧宣传攻势,不断利用南海问题煽动国内民众情绪。在越南5月13日暴力反华事件发生后,《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以“菲律宾和越南应该团结起来对抗与中国的海上争端”为题刊出报道,致使在马尼拉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东亚会议也不得不提高安保级别。

在这一阶段,菲政府利用南海问题,不仅顺利重启了军队现代化计划,还使军费获得大幅度增长,2013年国防预算高达21.4亿美元,较

2007年的10.2亿美元翻了一番。^[1]阿基诺三世更是在2013年5月21日的海军建军115周年纪念仪式上承诺拨款18亿美元,用以提高军队保卫领海的能力。

总的来看,南海问题已经成为菲律宾军事发展的重要支撑。首先,南海问题为军费增长提供合法借口。菲律宾人口众多,经济资源人均占有量并不乐观。据联合国统计,2011年菲人均国民收入为3117美元,低于东盟人均国民收入平均水平。^[2]与此同时,菲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和提高就业率方面成效甚微。20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菲律宾目前贫富分化程度严重,其基尼系数高达44%,高于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越南。报告强调,巨大的贫富鸿沟可能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危及社会稳定。^[3]在这一形势下,菲律宾国防预算连年增长并实现跃升,其主要动力正是缘于通过炒作南海问题而获得民众的支持。其次,南海争端是保持美国驻菲军事存在的重要理由。1991年美军撤出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后,菲律宾通过《部队访问协定》、《后勤互助协定》以及定期联合军演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军事联系。尤其在“9·11”事件后,美军借口打击菲律宾南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派出特遣部队长驻菲律宾棉兰老岛。对于美国的军事存在,菲律宾社会意见不一,每年都会爆发数次反美示威游行。尤其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南部地区,尽管美军拥有“反恐”的正当理由,但穆斯林民众视美军的存在为一种殖民行为,从而更加激化了南部穆斯林地区和菲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南海争端则为菲律宾政府将国内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提供了有效途径,既可以保持美军特遣部队的实体存在,又可以为美军援助和培训菲部队提供有利条件。再次,南海争端是菲律宾谋取地区优势的突破口。中国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

[1]数据来源: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Philippines (TradingEconomics), Philippines Military expenditures (IndextMundi)。

[2]数据来源: World Statistics Pocketbook: Philippines,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Undata)。

[3]《研究指菲律宾贫富分化严重,或危及社会稳定》,2011-07-23,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7-23/3204408.shtml>, 2013-12-08。

的实力快速增长,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也日渐扩大。这不能不引起美国的忧虑。为了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奥巴马政府制定“重返亚洲”战略,并以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为抓手,通过在亚洲的盟友为其重返铺平道路。美国的重返,意味着菲律宾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传统盟友的战略价值的回归,菲律宾将获得更多来自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也是菲军现代化计划得以展开的重要保障之一。除此之外,南海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对于改变菲律宾的贫油现状,提升菲能源安全系数也至关重要。

三、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未来动向

对菲律宾政府而言,南海问题为其军事力量发展和海上能源开发提供了机会。这就意味着,今后菲律宾政府并不希望南海争端走向缓和,而是想通过不断促使南海问题扩大化来为期谋取最大的国家利益。

首先,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声索对象范围不断扩大。冷战时期,菲律宾对南海岛礁的关注仅集中于所谓的“卡拉延群岛”及其周边海域;至20世纪90年代,菲政府将所谓主权范围从卡拉延群岛扩展至黄岩岛;2012年9月,菲政府通过29号法令,将西菲近海原称为“南中国海”的区域更名为“西菲律宾海”。这一扩大趋势不仅反映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不断膨胀的野心,还体现了其欲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图谋。

其次,菲律宾在东盟内部极力推动南海问题扩大化。有消息显示,早在2000—2002年中国和东盟磋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时,南海问题其他相关方就曾提出集体与中国对话的条款,试图将南海问题扩大到整个东盟范围。尔后,菲律宾又联合越南计划将其制度化为《南海行为准则》(COC),并希望得到美国等域外大国的支持。2012年9月,阿基诺三世在APEC峰会期间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谈,菲外长罗萨里奥随即宣称“新加坡支持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并感谢李显龙对菲律宾的“支持”。罗萨里奥试图传达出菲律宾已获得东盟其他国家的

声援,然而新加坡外长尚穆根旋即于9月11日发表声明,回应东盟不会介入南海主权争议以示澄清。2014年5月10日,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南海问题是第24届东盟峰会的主要议题,为菲总统阿基诺三世的出席造势。11日,阿基诺三世利用东盟领导人全体会议的时机,催促各国领导人“共同面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企图在此次峰会上“捆绑”南海问题。2014年5月21日,就在越南发生反华暴力事件后,菲总统阿基诺三世会见来访的越南总理,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的防务交流与合作。这一系列动作透露出菲律宾仍将继续在东盟内部推动南海问题扩大化的图谋。

第三,菲律宾还不断推动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自2001年中、美在南海发生撞机事件后,菲律宾不失时机的对外传达出“美国支持”这样一种信息。2004年2月23日,美、菲定期联合军事演习(Balikatan 2004)出现重要变化:首次将演习地点选择在巴拉望西面的岛屿,涉及争议海域,并将目标重点定为抵御外来侵略。2009年3月8日,中、美再次发生舰艇对峙事件,10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签署《领海基线法案》。2010年7月底,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外长论坛上表示对南海问题的关切后,菲律宾政府对“美国支持”的信心走向公开化。2010年9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美时向奥巴马提出关于由美国牵头制定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2012年9月12日,阿基诺三世签署29号总统法令仅5天时间,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接受菲ANC电视台采访时称:如果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遭到攻击,将被纳入菲美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2014年4月奥巴马访菲期间,菲、美签署加强防务合作的协定,两国定期联合军事演习(Balikatan 2014)模拟两栖攻击演习,再次表露出针对中国的意图。菲律宾不时在各种场合表露出美菲的盟友关系,制造关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全面支持菲律宾的印象。不仅如此,菲律宾也向日本示好。自2011年起,菲律宾政府就开始与日本举行有关海洋安全问题的高层会谈。2012年4月,日本自卫队首次参加美、菲定期联合军演(Balikatan 2012),7月,日、菲双方签署防卫合作备忘录。另外,日本政府在多个场合表示将向菲方提供巡逻舰,而菲方则向日

本海上保安厅船只提供停泊港口,菲外长罗萨里奥也对外声援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实现再武装化。另一方面,菲律宾不断邀请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南海油气。至2014年,美国、瑞典、澳大利亚、英国、马来西亚等多国的石油公司涉及与菲律宾合作开发争议海域。菲律宾政府还声称,他们将会向更多的私营公司发放在南海勘探石油和天然气的许可证。菲律宾极力引进外国公司介入南沙海域的石油开发,企图将更多的国家牵涉进南海争议海域以达到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目的,为其炒作南海问题增加筹码。

除此之外,菲律宾还为其声索行为制造国际舆论。29号法令签署后,菲政府要求国家测绘和资源信息局绘制和出版涵盖“西菲律宾海”的官方地图,不仅替换所有政府部门现有的版本,并将其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等。2013年1月,菲律宾政府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法庭。2014年3月底,菲律宾又向国际仲裁法庭提交了一份长达数千页的起诉状,“状告”中国的南海九段线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由此看来,菲政府不仅不打算放弃炒作南海问题,还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南海问题的扩大化,并联合美、日、澳等域外大国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为实施军队现代化计划、转嫁国内政治矛盾等目的服务。这也意味着,南海争端将以不断复杂化的方式长期存在下去。

四、余 论

综上,菲律宾的军队建设与南海问题密切相关,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为菲军现代化计划提供了合法借口,并成为未来菲律宾军力提升的重要支撑。这就意味着,菲律宾政府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将充分利用南海问题,以实现军事力量的扩充和发展。对于菲律宾利用南海问题谋求军事发展的战略意图,中国须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并妥善应对,避免菲律宾利用南海问题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

首要的是引导我国社会舆论积极宣传南海问题的真相,争取国际社

会的理解与支持,为国内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稳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其次,要适时通过经济手段制衡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过激行为。目前,虽然日本对菲直接投资排在首位,但中国大陆、港澳和台湾地区的直接投资总和远远超过日本。也就是说,中国已成为菲律宾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而菲律宾目前急需发展国内经济,经济问题对菲律宾的外交和国内形势具有重要的牵制作用。因此,中国不仅要与菲律宾展开经济合作交流,扩大经济联系,也要适时通过经济手段抑制菲律宾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激进态度。第三,要防止和避免出现菲律宾与越南联手共同对抗中国的可能,不使南海争端在东盟和国际上呈扩大化之势。最后,应加强与美国的战略互动,防止南海问题成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绊脚石。

不可否认,南海问题是一个长期性和历史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影响中国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南海的主权、资源之争不能变成意气之争,而是要通过理性处理化不利为有利,以保障中国发展、稳定的大局,真正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收稿日期:2014-05-10]

乌克兰危机对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深远

钱文荣

[内容提要]乌克兰大选结束,新总统产生,但乌克兰危机远未结束,而且危机对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将是深远的。主要有:乌克兰基本被纳入西方体系;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严重恶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全面发展;欧洲将重新受到美国的重视;国际能源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乌克兰危机对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会有所牵制,但奥巴马不会放弃“亚太再平衡”战略。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地缘政治 俄欧关系 美欧关系

[作者简介]钱文荣,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14)04-0087-07

由乌克兰临时政府组织、西方国家支持的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但是乌克兰危机远未结束,尤其是这场危机对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有一些人认为,现在已不是冷兵器时代,而是远程打击、无人机和网络战等高科技战争时代,什么“战略屏障”、“战略缓冲区(国)”等等地缘政治概念早已过时。然而,这次由西方一手策划和制造的乌克兰危机恰恰再次证明地缘政治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正在以新的形式和方式强化。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一次讲话中说:“19世纪继续存在,并将一直存在。忘掉世界是平的,忘掉技术是

伟大的民主推进器,忘掉国际法的细节,领土以及与之相随的血缘纽带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1]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罗伯特·D·卡普兰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发表的《地缘政治与新世界秩序》一文中说:“在地缘政治上,过去永远不会死亡,现代世界并不存在。”^[1]事实上,冷战结束 20 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论是发动科索沃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无论是到处策划“政权更迭”、“颜色革命”还是推行“北约东扩”以及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等等,都是为了改变战后地缘政治格局和《联合国宪章》框架下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目的就是为了长期称霸全球。这次乌克兰危机就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从未停止过的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一次新的努力,直接目标是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从长远目标来说,它是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它的影响将不限于欧洲,而是全球,因而也不是短暂的,而是深远的。同时,它也将进一步加速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一、乌克兰危机对西方与俄罗斯的主要影响

从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来说,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如果说冷战结束以来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中一直处在东倒(向俄罗斯)西歪(向西欧和美国)中摇摆不定的局面,这次危机导致乌克兰被基本纳入了西方阵营,尽管它还会与俄罗斯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甚至在经济上还有许多方面要依赖俄罗斯。但无论如何,正如俄罗斯分析家菲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所言:“危机前的那个乌克兰的形态已经不存在了”。^[2]其主要标志是乌克兰已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议》。这个协议的英文原文是叫“association agreement”。按照英文的原意应译为“准成员国协议”。现在新总统波罗申科已宣布将争取尽早加入欧盟。

[1] 罗伯特·D·卡普兰:《地缘政治与新世界秩序》,载美国《时代》周刊,2014年3月31日。

[2] 《必须尽快评估欧俄关系》,载法国《费加罗报》,2014年5月8日。

为此他将要考虑让乌退出独联体。美国和欧盟也会为此在背后大力推动。对俄罗斯来说,虽然得到了克里米亚,却总体上失去了乌克兰,也将削弱独联体,从而影响普京构建“欧亚联盟”的努力。今后的俄乌关系基本上属于正常国家关系,尽管东部地区很可能仍将是俄罗斯的半势力范围或“缓冲地带”。

第二,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严重恶化,主要体现在:

——北约宣布终止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重新将俄罗斯定为“对手”。北约不再遵守1997年与俄罗斯签订关于不在新加入北约的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常驻部队的协议,并已经开始在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驻军。美国在波兰近期已部署了12架F16战斗机,在波罗的海部署了10架F15战斗机。

——俄罗斯被开除后,8国集团重新回到7国集团。由于受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美国和欧盟几个大国的经济实力均不同程度地较大幅度下降,难以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因而20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7国集团今后可能将更多地集中讨论和应对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就像最近一次在布鲁塞尔召开的7国首脑会议那样,彻底改变了7国集团以应对全球经济为目的而成立的初衷。

——格鲁吉亚将加快加入欧盟和北约进程。芬兰也在考虑加入北约。

——美俄核裁军谈判短时期内难以恢复,俄罗斯还可能退出《削减核武器条约》,将使核裁军严重受挫。美国正在考虑加强核力量和反导能力。奥巴马倡导的所谓“零核世界”从此告吹。俄罗斯也在进一步发展核力量,以弥补其常规力量之不足。

——美欧对俄制裁使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各国的经贸关系各自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美国和欧盟与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和中亚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西方将利用一些中亚国家担心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在他们那里重演的心态,加紧拉拢中亚国家,离间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美国计划从阿富汗撤军后,将以反恐为名把重点转向中亚,以图进一步压缩俄罗斯战

略空间和削弱中国的影响。

——美国宣布中止美俄太空合作以及俄罗斯停止美国 GPS 在俄 11 个基站的军事活动。俄罗斯有可能停止向欧盟和美国提供他们至今仍依赖俄罗斯的航天技术和装备,如欧洲伽利略导航卫星用的俄罗斯火箭和美国送往太空的阿特拉斯五号运载火箭用的俄罗斯造发动机等。

第三,俄罗斯被迫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促使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第四,曾一度被低估了重要性的欧洲将重新受到美国的重视。美国为了拉住欧盟共同对付俄罗斯和稳定欧洲盟国特别是那些前苏联集团的东欧和北欧国家,将重新重视塑造跨大西洋两岸关系。美国还在鼓动欧盟参与“亚太再平衡战略”。

第五,欧洲将重新整合能源战略以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并将加快寻求新的能源来源和开发新能源。不久的将来,国际能源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从而影响地缘政治。这一点暂时还不明显,过三五年就会渐渐凸显出来。

但是,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不会完全回到冷战时期那种紧张的全面对抗状态。从美国方面来说,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它在叙利亚、伊朗和阿富汗问题上仍需要俄罗斯的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顺利。美国对俄罗斯停止反导谈判和太空合作(包括停止 GPS 在俄基站的军事用途的运作)是很焦虑的。俄罗斯也看到了这些弱点,将努力利用这些弱点尽可能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俄罗斯不可能完全游离在目前仍然是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之外。第二,美国决不允许中俄结盟。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就决定了的战略方针。早在 2008 年大选期间,有三位重量级前政府高官——前副国务卿和驻俄罗斯大使塔尔波特、美国安会前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李侃如和美国安会前负责俄罗斯事务的高级主任托马斯·格雷厄姆为首建议奥巴马努力改善美俄关系,以阻止中俄更加紧密地接近,并被奥巴马政府采纳。这就是奥巴马 2009 年当选后提出“重启”美俄关系的背景。这次乌克兰危机发生之

后,又有一些高官如前国务卿舒尔茨和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主席萨姆·纳恩等人又出来建议奥巴马过一段时间要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他们的主要理由也是考虑中国因素。白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正在要寻找机会。”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基本政策是有节制的对抗,有选择的合作。

从欧盟来说,第一,至少在今后若干年内(如5-10年)不可能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第二,苏联解体20多年来,欧盟主要大国尤其是德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巨大,德国在俄罗斯有6200家公司。其次是法国。法国不但拒绝美国的要求,决定继续向俄出售“西北风”战舰,同时近日又宣布要帮俄罗斯训练水兵。还有意大利是欧洲对俄出口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默克尔5月17日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专访时说:“尽管德俄有着重大意见分歧,但在中长期内与俄罗斯的紧密伙伴关系应该继续下去。德国没有必要制定全新的(对俄)政策。”^[1]据法国《世界报》报道,西班牙和希腊都反对对俄制裁。甚至英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硬不起来,因为伦敦金融中心在不小程度上靠着俄罗斯寡头政治执政者这些大客户。其他如塞浦路斯、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也有不同程度的保留。^[2]因此,在制裁问题上,欧盟与美国是有较大分歧的,在已实行的制裁措施上也有落差。而且普京也十分讲究策略,牢牢把握着一个度。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欧盟一再叫嚷的新制裁措施拖着不出笼的根本原因。

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俄罗斯在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中仍留有不同程度的外交余地和空间。

二、乌克兰危机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现在,国内外舆论和学界普遍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否会放弃,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是否又要回到欧洲了?笔者认为

[1]《俄罗斯又转向老思维模式》,载德国《法兰克福报》网站,2014年5月17日。

[2]《对俄罗斯制裁有所保留的大小原因》,载法国《世界报》,2014年3月21日。

为,乌克兰危机的产生对奥巴马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牵制,甚至可以说在近期一段时间内有较大牵制,但是他决不会放弃“亚太再平衡”战略。

首先,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基于美国统治阶层对当前和未来世界形势和国际力量变化的基本估计,他们认为亚太地区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又是安全问题集中地区。而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这是美国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全球战略重心,而非只是针对某个地区的一项具体战略。

第二,美国对俄罗斯的判断是:俄罗斯虽然有强大军事实力,尤其是核力量,但经济力量太弱,很可能会出现严重危机。同时,它认为普京之后俄罗斯不会再有强人,还认为俄罗斯的发展还是要靠西方,而不是中国,更不用说俄罗斯对中国也有戒心。因此,美国认定真正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

第三,虽然在美国统治集团和政治精英阶层中普遍认为中俄结成真正联盟的可能性不大,但仍然担心对俄逼得太紧将会促使中俄事实上的结盟,甚至美国国会都批评说:“我们的政策将俄罗斯推向中国。”^[1]他们认为哪怕是暂时的结盟也将对美国和西方极为不利,危及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动摇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第四,欧盟与美国不是一条心。美国认为俄罗斯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威胁,但欧盟并不认为俄罗斯是威胁,而是欧盟的巨大市场和发展的机遇,而且能源上至少今后若干年内还离不开俄罗斯的供应。现在的形势与冷战时期不一样,冷战时期,俄罗斯是美国和欧盟的共同的敌人。冷战后,欧盟认为俄罗斯不再是真正的威胁,更不是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奥巴马最近在西点军校讲话中高喊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但冷战结束初期那个“几乎一呼百应”的顶峰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如果美国硬要蛮干,到底会有多少国家会听它的是一个问号。

第五,美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还需要俄罗斯的合作,如伊朗、叙利亚,特别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需要俄罗斯同意过境,否则走南线过境

[1]《重返 G7——走入歧途的首脑会议》,载日本《美日新闻》,2014年6月2日。

巴基斯坦,不但花钱太多,而且很危险,将会遭到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袭击和破坏。

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不想把与俄罗斯的关系做绝。但目前的美俄紧张关系也不会很快过去。乌克兰事件后,美国更加认定俄罗斯为第二大威胁,是需要予以遏制的对象。美国参联会主席邓普西5月14日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会议上谈到世界战略格局时说:“当前的世界战略格局中存在两个重量级竞争者,即中国和俄罗斯。”^[1]从他对中俄两个威胁的排序中可以看出,中国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头号威胁。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战略遏制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奥巴马今年4月的亚洲之行及此后采取的实际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奥巴马访问日本时首次以总统身份宣布钓鱼岛问题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纵容日本与中国对着干;更重要的是他公开支持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这将对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严重影响。第二,与菲律宾签订了新防务合作条约。第三,在关于钻井平台问题上公开站在越南一边,公然一而再再而三指责中国。奥访日之后,接连派全球鹰进驻日本本土,现在是第一架,年内还要进驻第二架,计划总共进驻四架。在日本部署第二套X波段雷达。第四,无端提出起诉五个中国军人是黑客。现在又搞了第二批所谓黑客。最近,美国又利用纪念《与台湾关系法》35周年之机,美国国内至少开了五次研讨会,国会还为此举行了听证会,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加紧拉拢台湾加入TPP和亚太战略再平衡,把台湾的反导系统纳入美国的东亚反导系统之内,企图以此瓦解日益紧密的两岸关系。以上这些足以表明奥巴马没有也不会放弃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收稿日期:2014-06-15]

[1]《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网站,2014年6月25日。

面对乌克兰危机的欧洲形势

丁原洪

[内容提要] 欧盟策划了乌克兰“颜色革命”，但难以掌控乌克兰局势发展的情势，暴露了欧盟以下不足：经济持续低迷无法满足乌克兰财政援助的要求；难以采取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对外影响力下降；就业形势恶化，生活水平下降，极右势力上升，欧洲民众对欧盟信任度进一步下降。

[关键词] 欧洲形势 乌克兰局势

[作者简介] 丁原洪，外交部原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前驻欧盟大使。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14)04-0094-06

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阴云尚未消散之际，又爆发震惊全球的乌克兰危机，这使得欧洲形势受到更为剧烈的冲击，也使欧洲一体化前景更加暗淡。

欧洲是这次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它本想借助策动又一次“颜色革命”，扶植亲欧势力掌权，以最终将乌克兰纳入欧盟的势力范围。然而，出乎其预料的是，这场“颜色革命”虽然扳倒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却使乌克兰国内局势陷入混乱，并给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半岛提供了口实和机会。乌克兰面临进一步分裂的风险，而欧盟又无可奈何，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综观近半年来乌克兰危机的演变过程，不难看出欧盟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过于“雄心勃勃”，以为可以一举拿下乌克兰，而实际上自己并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硬软实力，反而暴露出自身的“弱点”。主要

有：

一、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国际竞争力下降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持续 4 年多，2013 年欧盟还被世界银行视为“拖累世界经济的主要因素”。欧盟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资金救助重债国、设立永久性稳定基金、力推财政紧缩、筹建银行业联盟等措施，虽对缓解危机起到一定作用，但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体制上存在的弊端，也未能解决欧洲国家在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全球化时代竞争力不断下降的难题。欧盟目前的经济形势可以从以下数字看出：2013 年欧盟经济为零增长，欧元区经济为 0.4% 负增长；据欧盟委员会预测，2014 年欧盟经济可增长 1.4%，欧元区增长 1.1%，实际上仍存在很大变数。据欧盟统计局的数字：2013 年 11 月，欧盟和欧元区失业率分别高达 12.1% 和 10.9%，为历史最高位；2013 年欧盟债务推高到占 GDP 的 96%，甚至高于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有分析家认为，欧盟有陷入日本式的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欧盟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强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硬要把一个负债累累、经济濒临破产的乌克兰拉入欧盟，显然是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亚努科维奇本来准备同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只是由于欧盟对其要求的财政援助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而不得不转向俄罗斯求援。当乌反对派夺权后，欧盟虽同意与乌签署“联系国”的政治部分条款，但对乌迫切需要的财经援助却依然无法满足，将这一问题推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而这必然会使乌克兰被迫接受该组织一系列附带条件和繁复的程序。经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头上允诺可提供百亿多欧元的援助，但前提是乌克兰必须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援远水解不了近渴，反而要乌克兰接受难以达到的苛刻条件，这使乌克兰“临时政府”大失所望，不得不回过头来寻求与俄“和解”。乌“临时政府”责令内务部收缴一些极右组织手中的武装，“临时政府”的总理并声言乌克兰不寻求加入北约，这其实是以俄方的要求向欧盟作出回应。

欧盟陷于目前的尴尬局面，根源于政治野心过大，而经济实力不济。

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缺失,削弱影响力

欧洲国家在启动政治经济一体化之初,就提出要致力于实现外交与安全政策一体化。然而,由于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这一目标不仅未能达到,而且随着成员国的扩大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实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设想已变得遥不可及,到了2003年,欧盟成员国终于因伊拉克战争而出现公开的分裂。这次乌克兰危机再一次暴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缺失,对欧盟发挥其应有影响力形成掣肘。

对俄关系和对美关系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必然涉及的两个重要方面。在这次乌克兰危机中,这两个方面都出了问题。

先看对俄关系。欧盟成员国由于国情差异、历史背景和地缘环境不同,在对俄关系上历来存在分歧。德、法等“老欧洲”国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出于安全与经济利益的考虑,倾向于与俄罗斯保持缓和、合作的态势,或者说在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方面要“适可而止”,不能逼人太甚。而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新欧洲”国家,由于对俄怀有宿怨,担心自身安全再遭威胁,总希望美欧,尤其是美国全力维护其安全,最好在它们与俄罗斯之间设一个“缓冲地带”。正是这种心态促使波兰等成为策动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的主力。同样是波兰(与瑞典联手)倡议欧盟召开“东方伙伴联系国峰会”,给予暂时无法入盟的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国有名无实的“联系国”地位,以进行安抚。在去年11月后上演的所谓第二次乌克兰“颜色革命”中,波兰等国的表现最为起劲。与2004年“橙色革命”所不同的是,这次波兰得到了德国的大力支持。这与这些年来德波联手扩大德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并巩固德国在欧盟事务中的主导权,是有关联的。

在俄罗斯强硬反击下,欧盟内部在对俄关系上的分歧再次让欧盟出丑。尽管“制裁”的言论叫得很响,但欧盟成员国由于处境不一,各有各的打算,迟迟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制裁举措,而且不得不吞下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的苦果,关键就在于欧盟28个成员国的“利益不一致”。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这是欧盟的“一个核心弱点”,在欧债危机之后,它又导致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中“名声扫地”。

再看对美关系。美欧同盟关系对双方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欧盟经济总量赶上美国、并因采用欧元这一统一货币而增强自身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之后,美国对欧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欧洲已从“可靠伙伴”逐渐演变成美国需要防范的“竞争对手”。在这个背景下,才出现了美国趁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之机,采取“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种种手段,以求遏制欧元的发展势头,以及对包括默克尔总理在内的广大欧洲民众进行监听、监控的不友好行动。奥巴马上台后,除决意将美国全球战略重点从欧洲移往亚太地区外,还刻意“冷淡”欧洲。他很少出访欧洲国家,有意不参加或者取消年度美欧峰会。即使这次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为显示“重视”欧洲,也只是在布鲁塞尔同欧盟领导人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工作午餐会”作为一次美欧峰会加以敷衍。

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先是责怪欧盟对俄“软弱”,不赞同欧方支持的乌总统候选人,后又不满意德、法、波三国外长同亚努科维奇签署的2月21日“和解”协议,硬是利用乌极右势力推翻该协议,用暴力赶走亚努科维奇,实现夺权。这不仅招致俄罗斯的强硬反击,而且也使欧盟失信誉,陷于被动。在克里米亚公投回归俄罗斯问题上,美国把“制裁”俄罗斯的调子唱得天响,可是自己只采取限制俄方若干人士入境并冻结其在美资产这种并无多大实效的措施,却要欧盟采取有实质意义的经贸制裁措施。美口头上声言支持欧洲国家减少从俄进口天然气,但当欧洲国家要美向欧出口天然气时,美方却又百般推诿。奥巴马在同欧盟领导人谈及此事时,甚至摆出“亲兄弟,明算账”的态度,暗示美向欧出口天然气要按市场价格付款,也就是高于欧从俄进口天然气价格60%。

不少美欧学者、媒体呼吁美国不要因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而忽略欧洲仍是美国主要盟友。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希望美国增兵欧洲。对此,美国领导人包括国防部长哈格尔当即明确表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不动摇。哈格尔3月30日讲话声称,美国支持北约盟友,但没有增兵欧洲的计划;甚至说“即便俄派遣军队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美国仍不会出兵”,“对美国的利益而言,亚洲和太平洋是最重要的地区”。美国近日

宣布要在乌克兰以及黑海地区进行多次军演以及派遣更多架次飞机去波罗的海三国巡逻,等等,也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那些对美国提供“安全保证”有点丧失信心的国家而已。

欧洲国家从这次乌克兰危机中再一次领悟到美欧同盟关系今非昔比的苦涩。2010年12月17日,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在向欧盟峰会提交的首份外交报告中就警告说,欧洲已不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欧洲国家应加强团结,以免影响影响力下降。不能不说她早有预见。

三、民众对一体化失去信心是欧盟的“致命伤”

欧债危机迟迟未解,经济复苏难以期盼,就业形势继续恶化,以及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本已极大地打击了民众对进一步推进一体化的热情。而这次欧盟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又“犯了严重错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语),既使俄罗斯趁机收回克里米亚,又被美国耍弄了一番,最后把乌克兰这个烂摊子甩给了欧盟。这也使欧洲民众对欧盟进一步失去信心。据欧盟委员会2013年12月20日发布的欧洲“晴雨表”调查,民众对欧盟的信任度从2007年的57%降至2013年的31%;对欧盟前途持乐观看法的从2007年的69%降至2013年的51%,悲观者从24%上升为43%。如果把乌克兰危机因素考虑在内,民众对欧盟的信任度只会进一步下降,而不会反降为升。

民众对欧盟信任度下降表现在各个方面:

1.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除德国外,欧盟各国的选举都是执政党“逢选必败”;即使德国,默克尔总理的执政联盟也不得不同最大的反对派——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默克尔推行的内外政策受到一定的牵制。

2. 受危机影响,欧盟各成员国都或多或少地把自身国家利益置于欧盟集体利益之上,尽可能多地把主权从欧盟机构中收回到本国政府手中。为实施一体化措施而设置的欧盟委员会的权力在减弱,被架空。

3. 由于民众不满情绪增长,在欧盟不少国家内部,“疑欧”势力增强,以“反欧洲一体化、反外来移民、反穆斯林”为宗旨的极右政党势力不断上升。在这股势力中,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荷兰自由党、意大利北方联盟等,在各自国内选举中支持率都有明显提升。2013年11月,

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和荷兰自由党主席威尔德斯在海牙会晤,决定组成一个“反欧盟联盟”,并同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北方联盟、英国独立党、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等磋商,准备在5月欧洲议会选举中组成一个独立的极右党团。据分析,它们有可能获得15%~25%的席位。这次选举虽不会改变中右翼人民党团和中左翼社会和民主党团在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但极右党团的出现将对欧盟今后政策制定产生不小的影响。

4.随着欧盟内部因债务危机而事实上形成分裂状况,不少国家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分裂势力,而且获得不少民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英国要举行“脱欧公投”,苏格兰今年将举行“独立公投”,以及主张分裂的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在该区势力不断壮大,以致影响比利时长期无法组阁等怪异现象。此次克里米亚“脱乌回俄”公投成功,不仅使有众多俄族居民的波罗的海三国倍感紧张,而且也使其他国家内部主张分裂的势力受到鼓舞。这一动向对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是十分不利的。

正是在上述种种因素作用下,目前动荡不安的情形笼罩着整个欧洲。

[收稿日期:2014-05-20]

当代世界价值观冲突与欧亚 一体化前景

A. B. 卢金

[内容提要]俄罗斯学者以前苏联和俄罗斯与西方文明的诞生、发展的历程进行对比,阐述了当代世界东西方的“价值观冲突”,并依此对欧亚一体化的前景做出展望,认为未来世界的主要界线仍然是价值观,一方面是绝对价值观支持者,另一方面是道德和价值观相对主义者。当前,西方强权虽在,但正在失去道义上的领导地位。文章引用了欧亚许多学者的观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价值观冲突 欧亚一体化

[作者简介]A. B. 卢金,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俄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亚和上海合作组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4)04-0100-11

一、西方文明的优势及其扩张性

西方文明的启蒙思想诞生之初就呈现出与线性发展理论相结合的优越性。

任何文明都有一种理念,认为自己的文明具有优势。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和中世纪的中国人及许多其他民族都认为自己达到了理想的巅峰。但是,西方的优势理论是由几个世纪的工业进步和军事实力支撑的,所

以西方线性发展的观念在很长时间流行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

这些思想的基础是西方 20 世纪多样化政治学说——从殖民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纳粹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尽管这些学说有明显的差异,但他们都认为,未来的世界将只有一个,其基础是(当然是西方)全世界文明最先进的部分,其他的文明都将逐渐向最先进文明的标准靠拢。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的优势开始逐渐减弱。西方的武器系统遍布全世界,但对“欠发达”地区的管控却更加困难。非殖民化导致非西方地区的自我意识在增强,大多数新成立的国家的民族自豪感最初虽体现在追赶理论上,但还是停留在西方优势的模式下。其实质是利用西方经济成就为突破口,融入现代世界(也就是西方社会)。它们被分裂为两个体系,部分体系向苏联体系发展,因为苏联本身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并确信,它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的领导者处于社会发展的前沿,而“资本主义世界”落后于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力地推进了非殖民化运动,这导致了在世界不同地区形成了大量的准军事化力量。二战严重打击了线性发展的思想,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出现了一种被西方普遍接受的力量,其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即声称摧毁一切西方制度。战胜纳粹使得西方文明各种力量得到空前的整合,虽然没有使线性发展的基本理论受到破坏,但却使人们明白了,“进步”这一理论将会遭遇很大的阻力,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和资源。战胜国的领导人显示了足够的政治智慧,特别是美国,决定不遗余力去巩固西方世界。

与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阵营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削弱西方对线性发展理论的信心,共产党人瓦解了这一理论。这是关于在何种价值观基础上建立最先进社会的争论。西方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这并非战争的结果,而是共产主义内部的瓦解,最明显地反映在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之中,它宣告了西方价值观和西方“进步”社会秩序获得了最终胜利并得到普遍认可。

西方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态度是由这种欣喜状态和西方相对经济疲软(与二战后时期相比)这两个因素来决定的。从理论上讲,存在可

能有两种选择:试图使俄罗斯被西方体系同化或者脱离西方体系。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有许多支持第一种选择的,试图向政治家们阐述,反俄罗斯的路线可能会导致莫斯科敌意的增加,而那些小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支持这种理念的有美国对外政策理论家乔治·凯南,以及许多著名的参议员和记者。但克林顿政府,包括后来的乔治·布什政府却赞成第二种选择:北约东扩,并试图说服俄罗斯,外国军队逼近其边界,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的。欧盟国家的领导人亦如此,日益将北约推进到俄罗斯的边境。俄罗斯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试图解释说,这样的政策鼓励了俄罗斯反西方情绪的增长,并巩固了专制主义支持者的地位。西方国家相信,世界所有国家的人都希望加入西方联盟,相信他们推行的价值观,如果某位统治者试图阻止这一自然进程,那么他们迟早会被民众抗议的浪潮所掀翻。

21世纪初国际形势的发展表明,对西方的信念只是一种神话。的确,西方成功地吸纳了一些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这里边有两个因素起了作用:文明的相似性(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造成的)和政治因素(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所继承的地缘政治条件)。与此同时,某些国家(比如波罗的海国家)大部分人民的不满和民权没有得到重视,有些国家政治因素凌驾于文化因素之上(比如,在波兰,对自己安全的担忧——也许是暂时的——远远超过与西方世俗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但也应该知道,西方的渗透在许多国家遇到了所有或者大部分居民的抵抗。

在现实中,一些与俄罗斯相邻国家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至少,这些国家的居民不接受加入西方对俄罗斯不利的结果。在格鲁吉亚,少数民族持这种立场,他们把俄罗斯视为防止被人数占多数的民族同化的保障。在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和加告兹也存在同样的情形,在那里分裂的主要原因是民族语言因素。然而,在摩尔多瓦境内分歧主要发生在赞成加入罗马尼亚的力量和寻求保护摩尔多瓦历史性国家地位和身份的力量之间。在乌克兰,分歧是因为地理缘故——构成国家大部分说乌克兰语的西部居民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乌克兰,即单民族国家,而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居民却认为自己的母语是俄语,而且该地区在历史上、文化上和

经济上与俄罗斯密不可分,他们当然不希望割断这种联系。这些矛盾并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问题。不明白这点,就不明白是西方导致格鲁吉亚被分裂,并可能使摩尔多瓦和乌克兰遭遇同样的命运。一些西方的分析家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正如美国政治家尼古拉·彼得罗夫透过分析了2013年欧盟对待乌克兰的方式后指出:“欧洲的谈判代表们并不是让乌克兰采取利用其与俄罗斯的文化、宗教和经济关系的策略,在西欧和俄罗斯之间的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而是从一开始就想尽一切办法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进行忠诚性测试。”^[1]

但是这些声音并没有被采纳。美国和欧盟选择了施压策略,比如在乌克兰问题上,施加的压力明显比俄罗斯施加的压力大得多。如果俄罗斯政府给亚努科维奇提供大量的财政援助,那么欧盟就会给乌克兰提供帮助,不断向基辅派遣政府高官,向亚努科维奇解释西欧一体化的美好前景。同时,他们还到反对派集会(在国际外交上完全不被承认的行为)上去发言,从而破坏试图加入欧盟的政府的政权基础,使政府受到极度刺激。这种非常无效的策略只能被理解为,其深刻的根源在于西方天然优越性的和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意识形态。

二、欧亚一体化的价值观基础

目前,西方在俄罗斯相邻国家扩张的进程放缓,其深层原因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或团体的个人意愿或阴谋。我们不应该忘记,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普京在俄罗斯以及亚努科维奇在乌克兰当权是自由选举(或多或少的自由选举)的结果,根据大量的独立调查的结果,这些政治家在自己国内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在摩尔多瓦,共产党领导人沃罗宁不止一次通过自由选举成为国家领导人。不久前,亲西方的的萨卡什维力也在格鲁吉亚选举中失去了权力。此外,更加有趣的是,普京在许多后苏联国家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其中包括在乌克兰。

[1]Nicolai N. Petro, “Recasting Ukraine’s identity?” 30 January 2009. <http://www.opendemocracy.net/article/email/recasting-ukraines-identity>.

这意味着, 这些国家并非个别领导人的行为阻碍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而恰恰相反, 这些领导人在个人情绪上有某些共同特点, 他们担心被欧洲完全同化, 渴望与俄罗斯保持某种特殊关系。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家具有很高的人气, 这表明他们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如果不考虑大多数居民的感觉, 这就意味着将使这个国家走向分裂。

可以想像, 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形, 除了直接原因(例如, 明确鼓励他们在后苏联国家执行西方政策), 也有更客观、更深层的原因。这些原因可以被认为是现代世界价值观冲突局面的基础。

自罗马时代开始的西方文明是在基督教基础上经数世纪发展起来的, 但是在近几个世纪却明显脱离了基督教。社会与自由主义思想世俗化的结合导致了相对道德的统治地位,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以它为基础。事实上, 不同的社会和文明, 尽管它们的思想宗教基础五花八门, 但总是有相似之处, 全部由自己的思想基础建立的宗教体系, 都是基于绝对价值观的原则。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 这些价值观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 其区别或多或少在于对好与坏的解释。但是无论何时, 何地, 人们都知道, 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的。通常, 善恶的标准被写在体现宗教传统的圣书、神话中, 在“神圣的传统”意识中被一代代地流传下来。

现代西方文明一直反对相对性原则的绝对化。但我们仍然可以在西方某些地方看到绝对道德的残余。比如, 在相对道德的支配下,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如果先前确定了标准, 被标注了“落后”与“保守”呢? 否认了绝对的标准, 就破坏了道德本身。阿伦特在参加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庭审后指出: “艾希曼说, 他知道他参与的最大的犯罪事实是什么, 但他坚持说, 如果他当时不这么做, 他就会受到良心的困扰。他的良心与道德相违背。这种对立恰好说明了在欧洲存在的道德崩溃。”^[1]

究竟什么是价值相对主义? 在现代西方以“人权”概念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中, 人可以做任何事情, 只要他的行为不影响他人的权利就行。没

[1]Lecture notes quoted in Michael Denny, “The Privilege of Ourselves,” in: Hannah Arendt: 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World, ed. Melvyn A. Hil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255.

有道德的约束,只有合法不合法。也就是说,通过人而非超人来确定人类行为的正义性。所有西方伦理学理论都是基于这个原则。20世纪的两个西方著名道德理论大家诺泽克和罗尔斯,尽管说法不一(一个是从个人自由的角度谈正义性,另一个是从某种普适正义的角度谈正义性),但都认为:没有超越社会基础的道德,而只有有社会基础的道德。

当然,我们可以说,世俗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独特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世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是基于一些绝对价值观的。因为事实上它的许多假设都是没有得到证实的,经不起逻辑分析。比如,在西方,保护“人权”的必要性占据了信仰课题的全部内容,这就是目前的西方精英们对“人权”的理解。在西方“人权”内涵的争论中,“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概念最近也遭到了批评(记得,功利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本塔姆把自然权利称为“通常的废话”,而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修辞上的胡说八道”或者“废话连篇”)^[1]。

这些类似的论点是西方意识形态主流论调,俄罗斯政论家斯米尔诺夫将其界定为“自由主义”,但我们在强调它的政治方向时,宁愿称之为“民主”:对“民主”的信仰,与现代西方精英所理解的“民主”无异。与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它只允许在自己的框架内讨论,超出这个框架就将受到惩罚,被完全误解、嘲笑,有时会受到国家支持的行政措施的惩罚。比如,在今天的西方大学可以自由讨论如何使民主更加有效,但是不可以提出是否需要民主这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如何实现男女平等,但不能讨论是否需要实现这种平等,等等。

这种意识形态与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思想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教义的来源不同:它不是最高的、不可知的权威,而是由某些世俗的政治家、记者、教授等组成的“社会进步力量”,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其他“欠发达”地区居民。这种强加机制具有明显的特征(比如,在“死刑”问题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移民都同意“死刑”;又如关于欧盟

[1]An Examin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Man and the Citizen Decreed by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in France //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Now First Collected: Under the Superintendence of His Executor, John Bowring. Edinburgh, 1839. P.501.

成员国资格问题,欧洲许多国家多次举行公民投票表决,为的是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这个世俗教义的来源的不同从本质上决定了意识形态和宗教世界观的差异。但如果其来源并不是绝对的,那么意识形态的教义就可能随社会“进步”的程度而改变。对民众公开的更高层次的宗教理论不属于讨论的范畴。因此,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不是真理必须适应社会,特别是当它远离教义,越来越沉浸在罪恶之中时,而是人们应远离罪恶,改变自己,接近绝对真理。

与此同时,以西方“进步”的观点看,我们这个地球上大多数的民众都被各种落后的宗教信仰所束缚,西方世界沉浸于自己的繁荣和自由,认为以下现象是不能接受的:消灭男女之间的性别界线、体外受精和代孕、安乐死、同性恋婚姻、解决软性毒品等等。

此外,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主导思想中,人权是绝对优先的,它形成于西方基督教世俗化理论中关于“自然权利”的思想,与其他大多数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他们的代表不仅拒绝将个人权利作为生活的一般用途,还拒绝将个人权利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将个人权利视作高于社会繁荣、稳定和和谐。而在中国,最高人权被认为是“生命权”,没有它,其它的权利都没有意义。首先,发展带来繁荣,尔后,发展带来个人权利。因此,中国模式在相对贫困的非洲、亚洲和拉美国家越来越受欢迎,在这些国家个人权利的延伸,尤其是异域少数民族的权利,不被视为优先事项。即使在印度和日本这样的西方化的民主国家,对“民主”的意识形态也存在着很大的疑问,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价值观。

与西欧不同,前苏联国家处于宗教复兴进程中,宗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的影响力日趋增长。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但他们都拒绝从务实的角度来分辨“邪恶”的现象。

苏联解体后大多数国家都对此不满。在这方面,在民众中享有很高声望的宗教领袖也支持自己的民众。因为,对发展的看法可以存在差异。如果把提高政治自由度、从约束个人发展的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更高的物质繁荣视作是人类存在的意义,那么西方社会就是向前发展的。如果认为,传统的基督教应当认为能带来真理的基督的出现是人类生活的

主要进步,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痛苦的,只为永恒的生命和财富做准备,从这个道理出发(例如,安乐死、同性恋婚姻,与动物发生性行为,在《新约》中多次探讨过)——这是回归,回归到基督教为之奋斗了几个世纪的秩序。从这个观点来看,西方并非处于世界前列,而是回到了史前时代。根据调查,不仅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的大多数基督教徒原则上同意这一点,后苏联国家的穆斯林、犹太教徒和佛教徒也同意这一点。

这种态度使赞同后苏联国家一体化的领导人日益受到欢迎。他们告诉人们:我们不是反动派和保守主义者,我们只是以不同的眼光看世界,并需要建立一个联盟,与我们观点一致的都可以加入。普京关于在欧亚大陆建立独立的力量中心的价值观基础正在于此,这个联盟已经包括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并且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还可能加入。经济也很重要,但还是其次的。西方挑起这些国家内部冲突的政策更有利于整合这个力量中心。

三、价值观的冲突

如果从更宽的视野看欧亚一体化,不是从与西方的关系,而是从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看,可能会得出更有普遍性的结论。新的力量中心不仅是在这里形成,而且在许多不同的地区形成——在中国、印度、巴西等等。宗教复兴不仅是在后苏联国家,而且在穆斯林世界和非洲发生(在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是一样的)。尽管存在着很多差异,但是这种一体化进程在任何地方都更多地以与现代西方鼓吹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为基础。在中国,是儒家所提倡的集体主义;在印度,印度教的作用日益增长;在非洲,传统的基督教强烈反对欧洲的教会所提供的模棱两可的道德创新;穆斯林世界通常认为现代西方是罪恶和放荡的中心。即使是温和的穆斯林领导人都不能全部接受西方文明,而是试图用它的成就创建自己的文明。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伊斯兰公民社会党著名理论家、前副总理易卜拉欣公开反对道德的相对性原则,他指出,“我们所期望的民

间社会,是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亚洲关于民间社会的理念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启蒙运动的社会哲学,宗教和民间社会从性质上说是不相容的,宗教一直是亚洲社会伟大力量的源泉,并继续作为堡垒,阻止社会道德的衰退”。^[1]

西方正在失去道义上的领导地位,其强权优势虽然还存在,但是已经明显减弱了,而财富上的吸引力也随着其他有效经济模式的出现而逐渐削弱,尤其是中国模式。有观点认为,所有国家的民众都希望西方化,它是必然要发生的,都需要放弃独裁政权。“它是必然要发生”,这种观点有其自身的邪恶性。最近的一个例子——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反独裁革命,这些革命促进了反西方势力的发展,而不是推翻本国政府。当然,欧洲并没有被阻碍西方化的敌对政府包围,但是却被仇视西方化的民众所包围。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的情况近似于希腊时期的世界:一方面,西方文明,也就是当时的希腊文明,几乎扩散到世界各地:政治语言、经济语言、文化语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西化的,无处不在,甚至在最仇视西方的国家(伊朗、中国)——都流行着西方政治模式:议会、宪法、政党等等。另一方面,西方在“冷战”结束后短暂的主导地位(与亚历山大大帝统一国家时期相比),眼看着被形成多股力量中心的多极化世界所取代,尽管这种多极化世界是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时刻准备挑战先前的霸主地位。

怎么样的权力中心是更成功的,哪个权力中心会被暂时比较强大的西方所吞食——目前尚不清楚。1998年,在一篇著名的《亚洲人会思考吗?》文章中,受过欧洲教育的新加坡知识分子写道:“只有时间能证明,亚洲社会是否会作为亚洲社会融入现代世界,而不是照搬西方。”^[1]如今,这个问题摆在所有具有潜力的力量中心的面前,其中包括欧亚力量中心。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推出更有吸引力的,比西方更有效的,并区别与西方的价值观体系和发展模式。刻板

[1]Anwar Ibrahim, The Asian Renaissance, Kuala Lumpur: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96, p.51.

的西方人自然会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发展道路是唯一的,西方在这条路上比其他人走得更远。但在本文中,我们试图阐明,其他选项是可能的,至少他们不仅有政治和经济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价值观基础。

目前,在现代西方占具统治地位的世俗自由主义思想正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虽然它代表着世界上最强大的部分,但是并非代表大部分文明,而只是世界人口的小部分。事实上,西方权力中心暂时是最强大的,这将刺激影响力较小的中心创建一个制衡它的联盟。金砖国家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过程,金砖国家由不同的国家组成,但却代表着非西方世界的利益诉求。

现在有目共睹的是,取得胜利的西方福山模式并不能反映全球政治的未来景象。但是也不能完全接受亨廷顿模式——“文明的冲突”模式。按照这个模式,盟友应当是正统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儒教中国和越南,穆斯林的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叙利亚。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除了文化因素,还有一系列其他因素对现实政治发挥着作用——地缘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

然而,尽管有以上作用因素,但是未来世界的主要分界线还是价值观。未来世界的一个特点是“价值观冲突”,一方面是绝对价值观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则是道德和价值观相对主义者。

将来谁住在哪个国家,属于哪个文明,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西方世界有足够多的绝对价值观的支持者,但他们的声音暂时被自由主义的世俗观支持者所淹没。比如,一个相当强大的天主教会,它不仅积极反对道义创新,而且,教皇弗朗西斯不久前还指出,他反对西方的经济模式、社会功利主义。这意味着与自由派人士相比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将更容易与罗马天主教找到共同语言。

关于上述内容,我还想指出的是,正如前面提到的,绝对价值观的支持者,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哈萨克斯坦,都不想把自己看作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传统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普京在2013年12月联邦会议总统咨文中,援引别尔嘉耶夫的话指出:“保守主义的意义并不在于

它阻碍了向前或向上运动,而在于它干扰了向下和向后运动,带来了混乱,并倒退到了原始状态。”^[1]

此外,我们不应当低估这样的事实,不采用西方文明的主要成果,在独裁领袖和体系下产生的西方提出的模式:由分权体系和法制保障的高度政治自由等,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种模式的吸引力。甚至不承认政治自由是人类最高目标,非常不人道地甚至是虚伪地认为它们是不必要的,并反对把它作为实现其更高目标的必要条件。这种反对态度往往是独裁者长期无效统治和各种镇压手段的理由。因而,理想的、有吸引力的非西方模式应当是与绝对价值观体系相结合的高水平的自由。会有人提出这样的模式,或者与以前模式的斗争将继续在两个传统敌对势力之间持续:价值观相对主义加上与价值观绝对主义相对的自由与独裁相结合,展现了未来。

[收稿日期:2014-07-23]

学术交流

7月16日,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接待全美犹太人委员会亚太研究所主席雅各布斯、所长劳温伯格来访,双方就中美关系、中东局势等进行深入交流。座谈会由研究中心主任王霄巍主持,研究中心部分学者、特约研究员以及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参加了座谈。

[1]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2 декабря 2013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news/19825>.